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二十一

最具影响力的
经济导师

(上册)

邢春茹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1623—1687年）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毛纺织作坊主的家庭。由于生活所迫，从14岁就外出谋生，先后在英国、法国、荷兰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和教授等。1644—1645年配第在荷兰莱顿大学学医，此后，到巴黎参加过穆尔塞尼学会（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学术组织，法国科学院的前身）的学术活动，在英国参加过伦敦哲学会的活动。1649年配第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后来又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被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又投靠了国王查理二世，并封为男爵，成为新贵族，担任爱尔兰测量总监，受赐大量土地。此后，配第曾经陆续创办过渔场、冶炼厂、铝矿等，还经营木材生意，晚年时他成了拥有27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兼资本家。

配第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64年写成，1691年出版）、《政治算术》（1672年前后写成，1690年出版）、《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前后写成，1691年出版）、《货币略论》（1682年写成，1695年出版）。

配第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着重对经济现象的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发现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思想。在研究货币问题时，他为了探求交换的规律性，“区分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真正的市场价格’”。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的价值，他指出：“自然价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他所说的“政治价格”是指受供求影响的在市场上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即市场价格。同

时他又把用货币表现的“政治价格”称为“真正的市场价格”。配第着重研究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并用实例说明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商品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商品价值大小成反比。

尽管配第提出了劳动决定交换价值的重要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价值论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首先，他在论述中把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还没有抽象出科学的价值概念；其次，他没有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贯彻始终，如在《赋税论》一书中，除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外，他还提出了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

除了劳动价值论之外，配第对分配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配第的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虽然在配第的研究中没有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范畴，但他的地租理论上说明的是剩余价值问题。配第的分配理论是以地租论为中心，以工资论为前提，基本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分配的特点。他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但在具体研究中，他又把工资和维持工人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认为工资是劳动者为了生活、为了劳动、为了繁殖所必需的物品决定的，并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只应等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但他认为决定工资的自然基础是维持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实际上他论述的是劳动力的价值。

在分配论中，配第还进一步论述了工资和地租的对立关系，认为地租的多少与工资的高低成反比例。他所说的地租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说明了地租的来源和它的剥削性质。但他认为地租是全部剩余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配第主要从量上对地租进行分析，没有对地租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使其论述存在一些混乱。同时配第还对级差地租和土地价格进行了初步分析。

由于配第把地租看做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他把利息作为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从地租中引申出来。他对利息高低的

说明也是从地租出发的，他还没有把利息率的高低和借贷资本的供求联系起来，更没有和利润与利润率联系起来，但他已认识到货币量与利率的关系。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出生于法国卢昂一个“长袍贵族”的家庭，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业结束后，他曾从事文学创作，不久后又转而从事司法工作。1690年起担任卢昂地方议会的法官。当时法国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下，农民受着严酷的封建剥削，再加上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片面强调发展对外贸易和手工业，禁止谷物输出，压低农产品价格，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布阿吉尔贝尔作为地方法官，目睹农村情况，满怀激情地揭露封建王朝和贵族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尖锐地抨击政府的赋税政策，坚决反对当时执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称是农业的辩护人，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称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乳头，农业兴旺是一切其他部门繁荣的基础，复兴法国经济，首先要保证农业的发展。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但是，他却因此而被流放外省，他的著作也被查禁。布阿吉尔贝尔晚年回到卢昂，直到去世。

主要经济著作包括：《法兰西详情》（1695或1697）、《法兰曲辩驳书》（1707）、《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租税的性质》。

布阿吉尔贝尔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财富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对财富及其来源的看法，是同重商主义把财富等同于货币的观点以及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过程的观点相对立的。布阿吉尔贝尔是从物质即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财富的，他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人的适当生活的各种物品。

从生产门类来看，财富是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从对人们使用的重要性来看，财富则是生活必需品、非必需品以及其他一切可以满足人们享用欲望的物品。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源泉，一切财富都源于土地耕种。他还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用于消费的物品不断增加，行业也在不断增多，财富是同今天文明和富足的国家的 200 多种行业联系在一起的。

在财富的理论中，布阿吉尔贝尔还分析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他指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农业是各行各业的基础，耕种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农业衰弱则一切行业凋零，各行业人民的生活也会发生困难。

对于如何增加财富，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从而又提出了经济协调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上各种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各产业部门之间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因为没有一种行业的失调能够不同时将它的不幸立刻或逐渐地反映到其他一切行业上去。为了维持经济协调和正确比例，他认为要听任大自然的安排，遵循自然规律。他所说的自然规律，指的是要使一切产品都按比例价格交换，而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是自然规律的要求。他认为自由竞争能够恰如其分地调节社会经济活动，使各行业保持平衡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所以，他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

价值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提出完整的价值理论，仅是提出了对价值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虽然重视商品的物质内容，不重视商品的交换价值，但他从实际生活中看到了交换的必要性，并在研究中涉及了交换的基础即商品的价值问题。

布阿吉尔贝尔指出，为了保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各种商品必须坚持按一定比例的价格进行等价交换，否则就会引起经济紊乱、商业停顿，使各行业蒙受极大苦难。他认为，一定比例的价格或者说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商品生产上“必须的费用”，而“必须的费用”又是以劳动耗费为基础的。这样，他虽然不是自

觉的，但事实上已把商品的交换归结为劳动时间。他认为，各行、世间的购买都是依一定比例进行的，各行业劳动者是以一定比例把自己的产品分开而相互购买的，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的劳动时间划分为一定比例来相互交换的。他进一步指出，各行业生产必须均衡发展劳动产品才有价值，否则劳动产品就会丧失价值。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来考察价值的。

布阿吉尔贝尔没有提出完整的价值理论，同配第一样他也没有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了解价值的本质，但是他在研究谷物价格和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关系时，不自觉地商品的交换价值说成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特别是他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均衡生产理论，使他能够在宏观的高度把握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把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视为由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在各个特殊部门来决定的。这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创见，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补充。他的这一思想，在西西蒙第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货币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轻视货币，贬低金银，甚至对货币持否定态度。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反对积累货币。他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一个国家的富足不在于它拥有的货币多少，而在于它拥有的物品的数量。货币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只是交换手段。他指责货币的出现破坏了商品按比例交换，商人为了积累货币财富，既剥削买者，又剥削卖者。不等价交换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没有困难，就可以不用货币，实行物物交换。布阿吉尔贝尔对货币的分析，批判了货币拜物教和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揭露了追求金钱而带来的种种恶果。但是他的保存小商品生产而废除货币的主张，说明他不懂货币的本质和货币产生的必然性，并且把货币的职能和货币资本的性质混同起来。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经济自由主义。

弗朗斯瓦·魁奈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在巴黎学医，后成为名医，曾写过医学和生理学论文。1749年出任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1752年被封为贵族。约在1753年，魁奈将近60岁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由于当时政府推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法国农业衰败、经济停滞、财政陷于困境。致使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和赋税问题成为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

魁奈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1756）、《经济表》（1758）、《农业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1758）、《经济表分析》（1766）等。

魁奈以“自然秩序”的思想研究经济学，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自然秩序”，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秩序”并使制定的政策法令与其相符合时，经济才能正常发展。相反，如违背“自然秩序”，经济就会遇到破坏。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在于探寻经济运动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理论是魁奈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按照魁奈的解释，“纯产品”是指农业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从价值的观点看，“纯产品”就是指农产品的价值减去为生产这些农产品所耗费的价值的余额，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财富不是货币，而是物质资料，即使用价值；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他认为，在充分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因此，流通领域不可能成为财富的源泉。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部门才是生产部门，而这样的部门只能是农业部门。因为农业生

产的结果，不仅会使生产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得到重新补偿，而且会带来一个增加额。由于他没有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而只是从使用价值来考察“纯产品”，因此，不理解资本主义工业也生产“纯产品”。但他完全从生产领域来研究“纯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是他的科学功绩。

魁奈以“纯产品”理论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了阶级划分。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收入，即“纯产品”来生活。不生产阶级，是由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别种劳动的人组成，他们的支出，是从生产阶级和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来源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魁奈试图从社会成员对“纯产品”的关系的角度来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阶级划分是有积极意义的。

魁奈对“资本”概念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于只有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农业才是“纯产品”的惟一源泉，因而只有投入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的资本，工商业资本不是生产的资本。魁奈把农业资本区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部分。“年预付”就是每年要预付出去的那部分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工资等。“原预付”就是几年预付一次的那部分资本，如牲畜、农具、仓库、房屋等。在再生产过程中，“年预付”全部进入生产费用之内。“原预付”只部分进入生产费用之内，需要在若干年之内，才能完全得到补偿。魁奈对农业资本的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他所说的“原预付”即相当于固定资本，“年预付”即相当于流动资本。

魁奈阐述的“纯产品”、社会阶级结构和资本的理论为他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准备了前提条件。他的这种分析，体现在他的著名的《经济表》中。魁奈的《经济表》有原表、略表。《经济表》的原表发表于1758年，但由于图解复杂，很难理解，所以流传不广。1760年魁奈为说明“原表”，写了题为《经济表分析》的论文，并把图解加以简化。经济表所分析的，实际

上是当时法国社会总产品的流通和再生产问题。把资本运动表现为再生产过程，为科学地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开辟了道路。但由于该表没有正确的价值理论作基础，片面地把农业视为惟一的生产部门，没有把工业品列入社会总产品中，也没有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门，因此，不可能在理论上最终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

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23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希腊语，后又学习法律，但他热爱学习和研究哲学。1735—1737年旅居法国。1746和1747年两度担任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并随他出使维也纳和都灵。约在1750年间与斯密结识后成为密友。1752年出任爱丁堡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1763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任参赞，与巴黎思想界著名人士和重农学派来往密切。1767年任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1769年休谟隐居于爱丁堡。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1742）、《政治论丛》（1752）、《英格兰史》（1754—1762）、《经济学文集》（E·罗德温编，1955）。

休谟曾经对经济动机或者说“劳动的原因”进行过研究。这是他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层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和他在《人性论》中对人性的探讨之间的联系。休谟认为有四种“劳动的原因”：消费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快乐的欲望及获得的欲望。消费的欲望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行动的欲望主要指胜任挑战性工作的欲望，特别是商人的活动，以及更一般地说，“勤劳的职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快乐的欲望主要指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但这不是劳动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但却是消费和有兴趣的活动的共同主要组成部分。劳动的最后原因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即积累在经济“赌博”中对获胜的欲望。休谟着重指出这些动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认为除了寻求快乐之外，人们还受许多“本能”驱使去干一些为干而干的事情，从而排除了财富和福利简单等同，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

的肯定埋下伏笔。

休谟对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市场关系进行过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部分是其经济理论研究中价值相对较小的部分。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他是 18 世纪货币数量论的著名代表。休谟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主张货币数量论，他否认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是决定价格的手段；商品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休谟这一观点是依据欧洲 16—17 世纪的情况提出的，由于当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黄金大量流入欧洲，货币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情况。当然，由于他不懂得价值，不懂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没有看到商品价格不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休谟不知道在使用金属货币时，商品价格的提高是由于金银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相比发生了变化。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由于美洲开采黄金的费用低廉，输入欧洲的黄金价值下降了。不过后来货币数量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解释纸币管理的理论依据，至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仍是沿着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起来的。

(2) 他运用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决重商主义的贸易收支自动平衡趋势和利用外贸顺差积累金银政策主张之间的悖论。他的立场是，由于硬币流通对贸易国的物价影响，每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会在进出口相等时趋于均衡。由此可见，能决定一国吸引并保持货币数量的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劳精神决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该国的贸易顺差。

(3) 攻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观点，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站在数量说的立场上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简单地提高所有价格而必然抵消为开支融资而增加的对贷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响。因此，决定利率的是真实资本供给。在这里休谟转向自然的历史研究方法。

(4) 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著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

(5) 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最优税收水平。

在休谟的经济哲学中他曾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最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此外，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知识的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意识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

在分配理论方面，休谟作为 18 世纪的经济学家已不同于 17 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对利息的说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利息和利润存在相互影响，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发展趋势，认为利息率低是经济发达的标志。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1723年6月13日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斯密从小勤奋好学，14岁进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深受苏格兰哲学家F·哈奇森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1740年毕业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获斯内尔奖学金，就学于牛津大学的巴利澳尔学院，直到1746年毕业。1748—1751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纯文学及法学，有一个时期还兼讲经济学。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与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D·休谟相识，并结为挚友。1751—1763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先后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政治经济学），并曾一度兼任副校长等职。在此期间，还积极参加经济学、文学、哲学等各种社会学术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75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6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64年2月辞去教授职务，转任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他去欧洲大陆旅行近三年。此间，在瑞士和巴黎见过F·M·伏尔泰、C·A·爱尔维修、J·R·达朗培尔、F·魁奈、A·R·J·杜尔哥等许多名流学者，同时开始着手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写作。1766年10月返回英国，1767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回国后，因从巴克勒公爵那里获得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得以在家乡闭门写作。经过10年的努力，1776年3月出版了自己的主要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博得了资产阶级的普遍赞扬，斯密的名声也随之大振，以至英国政府首相小彼得都拜

他为师，后来资产阶级学者也把他当做政治经济学之父来推崇。

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海关税务专员，定居于爱丁堡，并继续研究和写作。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又两次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每次任期一年），1790年7月17日去世。

斯密一生写过十几种有关社会科学的著作，但生前只出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其余书稿大都在他临终前由他一再敦促其挚友焚毁了。他去世后，由后人给他编辑或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795）、《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1896）、《亚当·斯密论美国革命》（1933）、《1762—1763，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有关修辞学和文学演讲稿》（1963）、《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六卷本）（1975—1980）。

斯密的体系把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独特形式的自然神学论与狭义的经济思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其中，他的经济理论又牢固地置于伦理哲学与历史的框架之中。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观和社会秩序观，构成了其中经济学的社会学基础。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的：自发、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其兵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他的经济学理论正是以这种基本观点为基础而对经济过程做出分析的。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从而形成一个用来说明市场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包括适应这种制度的经济政策）的完整经济学体系。

在微观经济学方面，他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以及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视为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

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形式和价格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并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率将趋于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但是，当他力图把价值论与分配论结合在一起时，斯密的论述有不少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成为后来的学者各取所需的源泉。

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变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近代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按照他的分析，这部分可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触发出他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著名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对生产性就业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奉为经典。

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在其中，政府只需维持和平，建立和维持一个严密的执法体制，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可以放心地让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他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体系，虽然其间

缺乏严密的逻辑以及存在各种矛盾，但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几乎从他还在世时开始，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至其他学者都力图使斯密的思想适应其某种体系或时尚。每一代人和每一个经济学派都在寻找“自己的亚当·斯密”，且总能如愿以偿。因此，把他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著作永远不失为经济学的经典。

安·杜尔哥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1727—1781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贵族家庭，早年在巴黎受神学教育，当过修道院院士和名誉副院长。1751年放弃神职从政，1761—1774年任利莫日州州长，他实行的税制改革等政策受到社会的赞誉。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后，他出任海军大臣。在任职内他推行重农主义政策，建立国内的谷物自由贸易，实行以赋税代徭役的制度，规定特权阶级必须纳税，取消酒类专营，废除行会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遭到贵族激烈地反对，1776年5月杜尔哥被迫离职。此后，他脱离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1781年3月在巴黎去世。

杜尔哥的主要经济著作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

杜尔哥虽未参加重农学派，但他完全赞同魁奈的经济学说并做了重要的发展。他接受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的观点，进一步把其中的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划分为企业家和工人两部分。企业家是大量资本的所有者，通过投资经营赚取利润。工人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挣得工资为生。并认为自由竞争使工资只限于维持工人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他还描述了雇佣工人产生的过程，认为他们是在不能再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情况下出现的。他对“纯产品”学说也做了重要发展，魁奈把“纯产品”说成是自然的恩赐。杜尔哥虽然接受自然恩赐的提法，但做了进一步解释，他强调这是自然对劳动的赐予，不是对土地经营者投资的赐予。他指出土地离开了劳动便不能生产任何东西，自然力只有与劳动结合才能生产出“纯产品”。在他看来，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自然生产力，使得农业劳动者在生产中能够生

产出大于自己所必需的产品。杜尔哥根据自己对“纯产品”的源泉的看法，认为土地所有者对“纯产品”的占有，就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占有。他不像魁奈等人那样认为地租是土地即自然的赐予，而认为地租是法权的表现，是土地私有权的结果。由此，“纯产品”实际上被看做劳动生产物中被地主阶级占有的剩余劳动产品。他没有正确的价值理论，因而还没有把“纯产品”归结为剩余价值。杜尔哥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了高峰，脱掉了封建外衣，显示出了其资本主义的本质。杜尔哥主张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所有者对商品能满足欲望的效用评价来决定，即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这一论点，使他成为边际效用价值论最早的思想先驱之一。

杜尔哥重农主义学说的发展，特别表现在他的工资理论上。魁奈已经指出劳动者的工资只限于维持他们最低生活必须的资料。但是，在魁奈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者”概念含混不清，并且，他也没有对工资决定的原因进行分析。杜尔哥在这两方面都弥补了魁奈的缺陷：首先，他明确了什么是“劳动者”。他认为，除了能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之外就一无所有的普通工人是“劳动者”。这就是说，他已经理解到工人是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了的生产者。其次，他说明了工资水平是怎样决定的。他从自由竞争的原则来分析，认为在雇佣劳动者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资本家有一大群工人可供选择，必然会优先选用那些要价最低的人。这样就使工人之间引起竞争，工人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工资而受雇于人，从而降低了工资水平。这样，工人的工资就只限于为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

杜尔哥在社会阶级结构分析上也发展了重农学派的理论。他在魁奈所划分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等三个阶级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生产阶级划分为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他对社会阶级的这种划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情况。他阐明了资产阶级是一个依靠资本剥削工人劳动的阶级，而工人则是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的被剥削阶级。杜尔哥在对社会阶级结构

作做进一步深入分析时，又比较正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他认为，雇佣工人只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时才产生的。然而，他把没有占有土地的整个农业阶级和工业阶级都看做是受土地所有者雇佣的阶级，按照这种说法，租地农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都包括在被雇佣的阶级中了。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杜尔哥还详细地考察了资本的五种使用方式：买进田产、租用土地、从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和放债。同时，他相当完备地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而且他认为利润和利息都是农产品的一部分，利息是出卖货币使用权的收入，正如出卖土地使用权收取地租一样。由于杜尔哥没有正确的劳动价值论作基础，只把农业看成是财富的惟一源泉，所以，他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性质，也不可能把剩余价值看做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

杜尔哥作为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除了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外，还通过社会改革的实践，来贯彻重农学派的政策主张。他曾提出了实行土地单一税、取消对粮食贸易的限制、废除农民的徭役、取消中世纪行会组织等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经济主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766出生于英国萨立州的一个土地贵族家庭，他早期受教育于其父丹尔·马尔萨斯，1784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798年担任英国萨立州奥尔堡镇的牧师，同年匿名发表《人口原理》初版，为统治阶级所赏识，一举成名。紧接着，他旅行各地，进一步收集资料，1803年他署真名的《人口原理》第二版以扩大篇幅出版，以后又经过多次修订再版。1825年，马尔萨斯因结婚而丧失神职。此后，他一直在郝福州海雷伯里学院（即东印度学院）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是英国获此头衔的第一人，直至1834年去世。

1811年起他开始与大卫·李嘉图通信并交往，经常进行激烈的争论，他的著作除《人口原理》（1898）外，还有《关于谷物的影响》（1814）、《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研究》（1815）、《经研法》（1817）、《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价值的尺度》（1823）、《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等。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欧文等是同时代人。英国工业革命趋于后期而产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斗争仍十分激烈，马尔萨斯则是处于正在没落的地主贵族阶级的代言人。他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别人的观点，人口理论来自唐森（JosephTousend），地租理论来自安德森，价值及销售理论来自斯密及西斯蒙第。他与李嘉图私人关系较为密切，但在理论上一直是对手和论敌，两人曾代表不同阶级长期论战，对经济思想史产生较大影响。西方经济界认为，马尔萨斯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两大贡献，其一为“人口论”，其二为“消费不足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最初是从如下两个前提出发的：第一，

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需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马尔萨斯断言在这两个前提下，人口的增长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在无所妨碍时，人口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比率增加，他写到：“随便假定世界有多少人口，比方假定有 10 亿，人类将以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那样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却以 1, 2, 3, 4, 5, 6, 7, 8, 9, 10 那样的增加率增加。”人口继续不断增加（超过食物之增加），便成为阻碍人类幸福进步的因素。由此，马尔萨斯进一步指出，由于自然法则，人类生活要有食物，人口的增加，不能超过足以供养人口的生活资料的最低营养。所以因获得食物困难所产生的对人口的强大压力，一定继续不断发挥作用，使大部分的人类感到贫困的恐慌。由于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有自然规律限制的，在人口增加趋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两者出现不平衡的时候，自然规律必然使两者之间恢复平衡，所以就发生贫困和罪恶来限制人口的增加。在《人口论》扩大的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又提出道德抑制，即无力抚养子女者不要结婚，或以晚婚作为预防抑制措施。根据这一人口论的原则，马尔萨斯反对当时英国的经济法，他指出，济贫法由于下面两点理由使贫民的环境恶化：第一，济贫法创造必须抚养的贫民；第二，济贫所为了一般在社会上不算最有价值的人所消费的食物量，使本来可以给予比较勤勉而有德者的分配量减少，将使更多的人失去独立。若这种分配引起价格上涨，会使济贫所以外的人受到更大压迫倾向。基于这种原因，马尔萨斯进一步指出，贫民本身就是贫困的原因。马尔萨斯用抽象的人。规律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及贫困的真正根源。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对于后来人口理论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人们一提起马尔萨斯，便会想到《人口原理》。实际上，马尔萨斯在经济学其他领域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如价值理论、有效需求理论、分配理论等。

马尔萨斯在分析产生生产过剩的原因时，论证了他的消费不足论，他认为只有增加供给的生产力与刺激需求的手段相结合，

才能保证财富的持续增长，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生产普遍过剩的危机，他还利用这一理论为地主阶级的非生产消费进行辩解。他指出，在出现生产过剩时，即使资本家进行投资，增加对生产性劳动的需要，也仍不足以购买所生产的物品。其基本理论是：对劳动的需要是由对物质的需要引申出来的，仅增加对必需品和便利品的需要，而不增加对奢侈品的需要，其结果必是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认为，为消除消费不足现象，宜鼓励两种人的消费：其一是地主阶级，因为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是差额收入，依地租而增加的支出，会增加有效需求；其二是非生产阶级的消费支出，马尔萨斯所称的非生产阶级指的是仆婢、政治家、医师、法官、律师、店员等。这些人的雇佣不增加物品的生产，但支出则增加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可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为增加国家的财富，并维持经济社会的稳定，生产性劳动及非生产性劳动的雇佣宜维持适当比率。

马尔萨斯是第一个讨论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同时指出，经济体系并非完全自我调整的。当然，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经济周期理论，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萧条严重，他的消费不足论才受到注意。凯恩斯把马尔萨斯视为“有效需求理论”创始人和自己的理论先驱。

让·巴蒂斯特·萨伊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767年出生于法国里昂市的一个商人家庭，在日内瓦长大。早先曾当店铺学徒，后随其兄赴英国，在伦敦附近一家商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国。虽然他酷爱文学，但遵父命，不得已进入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任职。公司经理就是后来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格拉维尔。当时，格拉维尔将斯密的《国富论》推荐给萨伊，萨伊如获至宝。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革命初期大资产阶级执政时，他曾热烈拥护革命，1792年参加志愿军。但雅各宾派上台后，他就离开军队，跟随大资产阶级一道反对革命。1816年起，他在亚森尼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这是法国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1830年，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832年病逝。

1803年萨伊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该书以通俗形式解释斯密的经济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萨伊称为亚当·斯密学说在欧洲大陆的继承者和普及者。他既用简单的方式把斯密的理论条理化、系统化，又把斯密经济理论中的非科学成分分离出来并加以发挥，创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庸俗理论体系。萨伊的著作还有《政治经济学全书》六卷（1828—1829）等。

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三分法，效用价值论，生产要素论，三位一体公式和销售论等，对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三分法

萨伊认为，在长时间里，人们把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混为一

谈，他区分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认为前者研究的是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而后者研究的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相应地他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部分。这就是几乎被后来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所谓的三分法。萨伊还把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较，认为政治经济学和化学、物理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

萨伊把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在严格科学规律名义下，把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他的三分法把生产、分配和消费看成一般形态，抽去了他们的特殊性和历史性。这些都使他能用对物质生产一般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研究代替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

效用价值论和生产三要素论

萨伊认为生产不创造价值，只创造效用。所谓的效用是指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使用价值），它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是生产的三个要素，它们在生产中共同创造了效用，从而共同创造了价值。萨伊企图用使用价值来说明价值，但使用价值千差万别难以比较，无法确定。于是他转而求助于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他说物品价值是测量效用的尺度，价格又是测定价值的尺度，而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但市场供求只能说明价格与价值背离程度，并不能说明价格与价值本身，萨伊又用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说明价值，回到生产费用价值论上来。

萨伊的效用价值论在说明价值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使后来的经济学家抛弃了他的效用的使用价值内涵，逐渐发展起一套主观效用价值论。但他的生产三要素论却被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推崇和应用。

分配论

萨伊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要素论基础上阐明了分配论。他认为既然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了价值，那么这三种要素的所

有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就应该得到各自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各阶级的收入都有自己独立的源泉。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彻底庸俗化。它既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又抹杀了资本主义分配的历史性。这一公式一直被西方经济学家用来作为分析收入的依据。

销售论

销售论在萨伊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萨伊认为产品的销售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换。他认为，在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过程中，货币只起瞬间作用，交换结束时将发现总是一种产品交换另一种产品。所以，在交换中，卖者同时也是其他商品的买者，供给会创造需求，整个社会中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相等，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能发生。市场上有时会出现某种产品的滞销，这是暂时现象，自由竞争会自动调节，使各种产品的供求趋于平衡。他由此得出四个结论：生产越多销路越快；一个企业成功，可以帮助其他企业达到成功；进口国外商品不会损害国内的生产；仅仅鼓励消费无益于商业，重要的是激励生产。

萨伊的销售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混同了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又把商品流通归结为物物交换，否认全面的经济危机。

罗伯特·欧文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小手工业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只读过4年书，年仅10岁的欧文便外出谋生，曾当过商店的学徒和雇员等。在辛苦的劳动之余刻苦自学。并对社会有广泛的了解，目睹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1789年欧文与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生产纺棉机的小厂，成为小业主。1791年起先后被聘为大纺织厂和著名公司的经理，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工厂在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从而使他在全英棉纺织业界赢得了声誉。不久他就辞去经理职务与另一家纱厂合作，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很快把这家厂办成拥有几个分厂的联合公司，欧文成为拥有相当股份的股东。1800年欧文担任新拉纳克纺织厂的经理，以慈善的目的进行改革，因成绩卓著而声誉日增。1820年前后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个时期，他从一个慈善家转变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1824年他和他的信徒们到美国进行“新协和公社”试验。四年后此举失败，他又投入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并继续宣传和推行他的各种试验方案。1833年他领导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实质上是英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1834年该组织被迫解散后，他又继续推行小型试验，如建立“和谐大厦”和“皇后林新村”都没有成功。

欧文的代表作品是：《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1816）、《致拉纳克郡的报告》（1820）、《论全新的社会状态的演讲》（1830）、《新道德世界书》（1842—1844）、《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等。

欧文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他明确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是阻挡资本主义制度改造的三大障碍中

的祸首。因此他主张要取得人类的幸福，必须实行公有制。他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论，并能够较正确地运用这一理论。他认为既然财富是劳动创造的，那就应该由劳动者共同享有，而事实上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剥削了工人。劳动者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大机器的使用加剧了劳动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一方面大机器的使用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财富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结果世界上充满了财富，然而这财富却不能被创造者——工人所拥有，整个世界到处笼罩着贫困。在这里他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中两大阶级的对立。就这种对立而言，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进行人类事业的巨大变革。他还把经济危机的产生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但是他未能由此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把解决这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了剥削阶级身上。

欧文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合作公社”，它实行财产公有制，公社全体成员集体进行生产劳动和消费。在公社里，劳动是自愿的愉快的事情，每个成员都应该被分配给适当的工作，同时需要从事多种工农业劳动，既各尽所能，又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由于产品十分丰富，分配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他还十分重视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来促进劳动者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使得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他又主张公社应当把城市和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包含了消灭工农差别、城市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的萌芽。显然，欧文的这些设想具有对共产主义的天才猜测。欧文设想的公社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但是他比傅立叶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公社之间存在着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换，这种交换遵循着等量交换的原则。不过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总的来说，欧文的“合作公社”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欧文对货币持否定态度，认为它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它不仅使资本家有可能剥削工人，而且也限制了财富的生产。

他主张既然劳动创造价值，就应该直接以劳动为价值尺度，而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价值尺度。为此他曾经建立过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实行劳动券制度，即劳动者将自己的产品交给市场，同时获得相应的劳动券，然后凭券向市场领取等价的其他劳动产品。欧文企图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端，这说明他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时他也不了解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以及商品经济的进步作用。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品经济，只能是空想。同样，这种试图在维护私有制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有组织的交换，也同样是一种空想，所以他的交换市场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

欧文是个杰出的社会实践家。他的思想学说的形成始终同他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他先后进行过以慈善为目的的“新拉纳克”管理、公平交换市场和空想共产主义即“新协和公社”的试验，又是全国性工会组织形式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还创办过幼儿园、工人学校和公共食堂。他一生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积极推行其改造社会的试验方案，这些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总之，英国当时一切有利于工人的社会运动和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代表和完成者。1772年出身于英国伦敦一个犹太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一位富有的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他14岁就结束了正规教育，跟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20岁时他和异教徒女子普利丝娜恋爱，遭到父亲坚决反对。1793年迫于婚姻和宗教问题，与家庭脱离关系，并开始独立从事证券交易业务。1797年年仅25岁的他拥有3000万法郎的财产，成为当时的巨富。随后，为了弥补早年教育的不足，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学术研习，如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学和地理学等。1799年，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823年9月12日病逝，终年51岁。

李嘉图研究经济是从论述货币开始的。1809年他首次在英国匿名发表《论黄金的价格》一文，奠定了自己货币理论的基础。在英国所谓“金价论战”时期（1808—1811），李嘉图写了不少关于货币问题的文章、小册子和札记。在这些论著中，他把英国自1797年停止银行券兑现以来出现金价上涨和物价上涨以及英镑汇价下跌的现象，归因于银行发行过多造成银行券贬值，主张恢复银行券兑现，以稳定国家的币制。李嘉图的理论观点带有强烈的党派色彩，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因此，他博得了著名货币理论家的声誉，被邀请参加了议会的金价委员会的工作。1811年他发表了《答博赞克先生关于金价委员会报告的实际感观》。此后，其经济注意力转向“谷物法”的论战。1815年，他发表了《论谷物价格的低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1816年发表了《关于一种经济而稳定的通货的建议》。1817年李嘉图出版了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部著作出版后，

人们把李嘉图看成是政治经济学的权威，以他为核心，聚集了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创立政治经济学会，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李嘉图学派。

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他虽然没有参加政党，但却是托利党（保守党）政府反对派中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最激进的集团中的一员。1822年，他又发表了《论对农业的保护》，指出地主阶级利益与工业资产阶级和全社会利益的矛盾，主张废除谷物法，鼓吹议会改革，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宗教专制。除去上述著作之外，李嘉图一生中还写了大量有关经济问题的通信。马克思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评价很高，认为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做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于1817年出版后轰动一时，被誉为继斯密《国富论》之后的经济学巨著。这是李嘉图的成名代表作，其重要性与影响性与斯密的《国富论》并列。但其结构比较松散，只是前两章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受。《税赋原理》共32章，前6章，特别是前3章阐述李嘉图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李嘉图接受边沁的功利主义，维护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资本按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来进行分配的重要条件。

李嘉图在《税赋原理》中，始终一贯的使用抽象法。从劳动价值的原理出发，考察其他的经济范畴，建立起前后一贯的完整体系。但他把资本主义关系看做是永恒的，仅把历史发展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难以看到经济范畴由于生产关系变化而引起的变形和复杂化，往往跳过一些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去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使其理论存在一些矛盾。

李嘉图肯定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并认识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批评斯密树立了两个价值标准尺度，批评斯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但他也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不了解劳动的二重性。李嘉图把商品分为二类（有稀少性决定和由人类劳动决定的），指出不同性质劳动在决定价值

上的定义，把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归为最差条件下的劳动，初步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

分配论是李嘉图经济学的核心，他在《赋税原理》的序言中曾说，说明社会产品如何分配为地租、利润和工资，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从工资学出发，把工资同雇佣工人收入相联系，研究了工资数量的基础和工资变动的规律：劳动的自然价格（工资的自然基础）、劳动的市场价格（工资变动规律）、工资下降的趋势。李嘉图把利润看做剩余价值的惟一的基本形式，只与工资相对应分析利润，实际上是以利润变化名义分析剩余价值。把商品全部价值分为工资、利润两部分，断定利润变化取决于工资的变化，变化方向相反，并指出劳动生产率是利润变动的最终原因。工资和利润相反变化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李嘉图忽略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没有对剩余价值本身进行分析。李嘉图认真地研究了地租的起源，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区分了真正的地租与名义地租，认为真正的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的产品，他指出地租的存在，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在肥沃程度及位置上的差别性。李嘉图地租理论以两个规律为基础：从优到劣的土地耕种顺序和土地收益递减。李嘉图地租理论也存在一定缺陷，如：把资本主义地租看做一般地租，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地租的历史特点，把土地肥沃程度和位置不同，说成是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而土地经营垄断才是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等。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内容和历史意义——对地租及利润的分析揭示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对立，成为反对“谷物法”的理论武器。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并论证了自由贸易对提高利润率的作用。比较成本学说：在自由贸易下，各国生产条件最好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成本不一定比别国的成本绝对地低，只要在本国各种产品中和与其他国产品比较相对低就可以进行交换，双方都可以获得较多的利益。他还给出了比较成本学说图示。比较成本学说在一定的前提

下，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同时也反映了英国对外扩张的需要。

除以上理论外，李嘉图对货币、资本积累、赋税等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让·西斯蒙第

让·西斯蒙第（1773—1842年）是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与李嘉图是同时代人，其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李嘉图修正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础上的。他既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又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经济浪漫主义的鼻祖，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双重地位。

1773年西斯蒙第出生于瑞士法语区日内瓦近郊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其祖先为意大利人。西斯蒙第曾在巴黎上过大学，后因父亲破产而中途辍学，到法国里昂的一家银行当职员。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他回到瑞士。不久瑞士爆发了革命，西斯蒙第和他的父亲因和某些贵族有密切的来往而被捕入狱。出狱后西斯蒙第起初举家迁居英国，后来又重返日内瓦。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西斯蒙第再度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远迁意大利，在那里置办农庄，经营农业。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1800年，当他重返日内瓦后，一直从事经济理论和历史研究，成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1842年6月25日，西斯蒙第在日内瓦病逝，终年69岁。

西斯蒙第曾于1801年发表其最早的著作《托斯卡那的农业》。1803年发表了《商业财富或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商业立法上的应用》，在此文中，他鼓吹和阐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使他获得了经济学家的声誉。其后15年间，他转而研究历史，写了《意大利共和国史》（1818）、《法国民族史》（生前完成29卷）。在这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英国在1815年和1818年爆发了经济危机，当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法国和瑞士而小生产者面临破产威胁的时候，西斯蒙第就一反自己的观点，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忠实信徒转而成为它的反对者，对斯密的学

说提出了修正，对李嘉图学说进行了尖锐批判。1819年，西斯蒙第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一书，他试图以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改造政治经济学。继《新原理》之后，他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进一步论证他在前书中所提出的原理。西斯蒙第认为他在这些著作中阐述了与英国古典学派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原理，把政治经济学带进了一个所谓的“新领域”，即经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的经济理论是以财富为起点，以消费先于生产的理论为基础，以收入分配为中心，以财富和人口的关系理论为研究的主要任务，以经济危机理论为全部经济理论的结论而展开的。他主张政治经济学主要目的不应仅研究如何增加财富，更重要的是使全体居民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增加财富是手段，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才是目的。他批判李嘉图的经济学为生产而生产，只注意增加财富而忘记了人。西斯蒙第认为生产是人类财富的源泉，消费是人们生产活动的动因，消费先于生产。他以孤立的个人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出发点，他指出一个人人生下来既带来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欲望，也带来了劳动的能力。他的欲望为他的劳动指出了方向，他的劳动创造财富，使欲望得到满足。由此，他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消费先于生产，生产自然与消费保持平衡，这时没有交换。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分工和交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需要由他人生产供给，自己的生产又供给他人需要的情况。这时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变为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但是消费仍然决定生产，供给与需求仍然要求保持平衡，否则，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人们的物质福利就会受到损害，他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批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认为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不了解社会消费需求，再加上激烈的竞争，使生产有盲目扩大的倾向。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创造的财富分为三种收入，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对劳动者的掠夺。由于工人得不到应有的收入，自由竞争使小生产者破产，占社会多数的劳动者收入在减少，虽然资本家增加了收入，但他们人数很少，增加的消费弥补不了多数人消费的减少，必然

存在消费不足。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消费不足使供给需求失衡，必然爆发经济危机，使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给劳动群众带来灾难。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改良，政府应当维护劳动者利益。限制自由竞争，使生产者同时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保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阻止社会化，在他看来这样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的福利。

西斯蒙第怀着对劳动群众的深切同情，揭露了资本主义存在消费与生产的矛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消费先于生产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消费是取决于生产，完全颠倒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自由竞争及分配制度的批判。因而，他在经济学说史上虽有独特的贡献，但是他不懂得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他的通过政府干预，阻止小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幻想。

西斯蒙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他第一个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发生经济危机。他将资本主义下的一切矛盾，都归结为消费和生产的矛盾，并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消费是矛盾的主要方向，消费不足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是消费不足危机论。他是经济思想史上消费不足危机论的首位人，确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危机存在的现实和不可避免性。经济危机理论既是他全部经济理论的归结，也是他成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重要标志。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出身于德国路特林根一个制鞋匠的家庭，他通过自学，参加了国家官吏考试，考试合格后，曾任会计检察官。1817年任教授。李斯特一生饱受迫害，他流亡在外，颠沛流离长达22年之久。于1846年去世。

李斯特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反对“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经济学；反对价值论，主张生产力论；反对自由贸易，主张贸易保护。

国家主义经济学

李斯特认为，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研究一种适合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规律”，但是不研究国家经济的发展，不研究每个国家特殊的发展道路。这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只有在世界上一切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都相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可是世界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因而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各国经济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发展经济的特殊道路。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应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而应是“国家主义经济学”。

生产力理论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李斯特系统地论述了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容。他把生产力分为四类：一是人的生产力，包括精神和肉体的；二是自然的生产力；三是社会的生产力，即社会的、市民的、政治的条件；四是物的生产力，即物质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资本的生产力。李斯特认为，在这四种生产力中，前四种是不可分离的，否则不能发生作用，而它们又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第四种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核心。

李斯特还提出了生产力平衡的协调发展的观点。他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农工商必须协调发展，商业是媒介，在工农业之间起协助和扩充的作用，工业对农业、商业及整个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他强调德国必须有自己的工业，在一国的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会受外国牵制。

实际上李斯特提出了国内经济结构和发展的理论。但是，该理论混淆了财富和交换价值，忽视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关于财富的源泉及其增长的理论，对生产力范畴做了不够精确的表达。

贸易保护主义

李斯特认为，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实行保护主义的政策。他认为，实行自由贸易，向外国购买廉价商品，初看起来似乎比较合算，但其结果，本国工业就不能发展，使德国工业始终处于落后的地位。相反，如果实行贸易保护，开始时会使产品价格提高，似乎不如进口外国商品合算，但通过一定时期，本国工业发展起来以后，成本和价格都会自然降下去，甚至会降到进口商品价格以下。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格有所牺牲却会使生产力发展，得失相抵而有余。

李斯特认为，各国要根据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他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并以此证明自己的经济政策。他把经济发展划分五个历史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李斯特认为，从经济发展之初到农业时期，应与经济更发达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当一国生产力发展了，发展到第五阶段，也应实行自由贸易，因为它不怕与外国竞争。只有在第三、第四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防止发达国家的工业品打击本国产业。

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就是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李斯特主张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发展初期，保护关税应定得相当轻微，随着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再逐渐提高。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反映了德国工业资产阶级力图对抗来自英国的竞争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他是 19 世纪上半叶德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得到恩格斯的肯定。他的经济思想对今天发展中国家是有现实参考作用的。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年）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最有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师，自由贸易派的旗帜，还是乐观主义的“经济利益和谐论”的提出者和鼓吹者。

巴斯夏出生于法国南部酿酒地区的一个富商家庭。他早年随叔父经商，并开始接触到萨伊和亚当·斯密的经济著作。1825年，24岁的巴斯夏获得祖父遗产后成为酿酒业的大资本家。法国1830年革命后，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久当选为缪格地区法官，后又作为本地区顾问。在七月王朝后巴斯夏迁居巴黎，从事经济学写作并赞成和倡导自由贸易。同时，他与英国同道者曼彻斯特学派联系，在1846年创建了“法国争取自由贸易协会”，并担任该会秘书和协会的机关杂志《自由贸易》的主编，写过许多论文和小册子，成为欧洲大陆主张自由贸易的代表人物。1848—184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被选为制宪会议和立法会议的代表，这个时期，他以反对“社会主义”为姿态，写了一些著作来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

巴斯夏著作很多，但最主要的代表性经济学著作有《经济论辩》（1847）和《经济和谐》（1850）。《经济和谐》这本书未最后完成，只出版了第一卷。它的特点是宣扬经济和谐，在此基础上说明乐观主义的劳资利益和谐的一致性。

服务价值论是“经济和谐论”的理论基础。巴斯夏认为服务的交换是人类的最高法则：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为的、不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和谐的、自然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中，和谐的建立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这种交换方式就是相互服务。服务，就是为满足别人欲望而做出的努力。就是说，人们通过交

换，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工作，从而提供相互的服务。同时价值存在于相互服务的比较评价之中。所谓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之间的关系，它反映服务提供者所做的努力和服务接受者所节省的努力。他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论把劳动理解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是错误的，劳动是一种努力、紧张。他强调价值量只与服务承受者因交换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或努力存在着的比例关系，他认为这是对李嘉图观点的重大修正，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政治经济学上的难题。

巴斯夏提出，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不能强迫人去做不利的买卖，而买卖双方的利益告诉人们，交换总是以等价为基础的。等价交换是一种公道的交换，这就说明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和谐的。在巴斯夏的服务价值理论中用到了萨伊经济理论中的“服务”概念。在萨伊那里，服务是指对效用的创造，在巴斯夏这里，服务是指替服务承受者所节约的努力，他们都抽掉了商品价值决定中所包含的经济关系。同时巴斯夏完全否定了商品的劳动生产过程，以此来否定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巴斯夏在自由竞争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造，主要是重复别人的论述。他认为商品生产者获得的最大利益的条件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即有关生产的一切决策（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等）均由私人生产者决定，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包括产量和价值等）的干预。即考虑生产者的利益，就是反对社会利益；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就是考虑社会利益。巴斯夏比较有影响的东西就是“丰富”和“不足”学说。他认为对社会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第一个角度是把社会看成生产者的总和考察，作为生产者的个人与社会是不和谐的。生产者希望社会物品“不足”，他才有利可图。同时他又要求贸易保护主义来帮助他垄断市场，而这恰好与社会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相矛盾，也与其他生产者的利益相矛盾。巴斯夏认为，中小资本家希望“不足”，希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工人也希望“不足”，从而可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提高工资，也希望借贸易保护主义来保证劳动市场的垄断。而这些都与社会利益

相冲突。第二个角度是把社会看成消费者总和来考察，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相一致，希望“丰富”物品，改善生活，也希望竞争自由，降低物价。而社会上只有大资产者赞成“丰富”，不怕竞争，提倡自由。贸易保护主义是保护生产者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维护消费者的，两相比较，“丰富”优于“不足”、自由主义优于保护主义。进行对大资产阶级的辩护。他认为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一样，也是实现社会进步和繁荣的基本保证，并据此来反对当时在法国广泛传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巴斯夏认为工资是对劳动提供服务的报酬，利息是对资本家延缓享乐即牺牲即时的满足的报酬，劳资关系是一致与和谐的。资本家为工人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资本的服务；工人替资本家劳动，这是工人的服务。利息和工资分别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随着生产发展、资本增加，利息会下降，所以资本所得份额的绝对量虽然和工人所得份额一样会增加，但其增加速度会低于工人所得；工人所得份额则无论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会增加的；并由此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各阶层都会无止境地接近于不断提高的水平。使其自身状况不断得到完善，而且自由竞争制度本身就具有促成各阶级平等和谐的趋向。他以此显示社会主义者企图以其他方式实现平等的主张是不可取的。

巴斯夏的“经济和谐”思想，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以后经济学家所探讨的“均衡”问题，实质上是经济和谐思想的另一种表述。

约翰·斯·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长子。穆勒幼小时，老穆勒就给予极严格的训练，3岁时由老穆勒亲自教授希腊文及数学；8岁学拉丁文；稍后又学几何学、代数学、化学及物理；12岁学逻辑学；13岁在父亲的指导下学完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和斯密的《国富论》；14岁到法国学习，先后寄宿在边沁和萨伊家中，受到他们两人思想的影响。1822年，进入他父亲任职的东印度公司服务。1828年任助理检察官，1836年老穆勒去世后接替父亲的职务。他在东印度公司服务35年，于1858年该公司解散时才退休。1865—1868年曾被选为下院议员，提出妇女参政权、比例代表制、爱尔兰土地改革等主张。

穆勒的著作主要有：《逻辑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未解决的问题》（1844）、《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主》（1859）、《政治、哲学及历史论集》（1859—1871）、《功利主义》（1863）、《自传》（1873）。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穆勒所著《政治经济学》一书，被认为是集古典学派理论之大成的著作。该书包括生产论、分配论、价格论、贸易条件的决定等方面内容。

他综合了当时的各种经济理论，修改了斯密、李嘉图关于经济规律普遍性和永恒性观点，把经济规律分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两类，认为前者是永恒的规律，不依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后者受人类意志的支配，取决于社会的习惯和法律等，因而是可改变的，为他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纲领提供了依据。

穆勒在形式上继承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同时把供求

论、生产费用论融进了他的价值理论中。他在论述价值决定时把商品分为三类：（1）数量有限、供给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如古董等，其价值决定于供求关系。（2）供给数量可以无限增加，而生产费用不会提高的商品，如工业品。其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其市场价值是供求的结果。生产费用具体地说即为工资加平均利润。（3）供给数量可以增加，而其单位生产费用也会随之提高的商品，如农产品。它的价值受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由生产所必需的供给量的最高生产费用决定。

在工资问题上，穆勒把李嘉图的自然工资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结合起来说明。在利润上既接受李嘉图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观点，又接受萨伊、西尼尔等人的观点，把利润分为利息、保险费和管理工资，分别用节欲、风险报酬和资本家劳动报酬来说明。其地租理论基本上沿袭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不同的是认为地主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绝对对立的。

穆勒在方法论上企图调和抽象法和历史方法，认为前者具有局限性，因而把历史方法引入经济学。穆勒还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人口、国际贸易及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做了论述。穆勒用折衷主义综合了各种经济学理论，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在几十年内被英国经济学界视为“无可置辩的圣经”。他的理论体系被视为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

赫尔曼·戈森

赫尔曼·戈森（1810—1858年）毕生从事于普通公务员的职务而无甚成就，到1847年离职后才专心编写著作。但他的写作生涯是很不幸的，前后花费20年时间写成的《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一书，于1845年出版后几乎没有销路，不得不在临死前自行收回。此书直到70年代经杰文斯和L·瓦尔拉斯发现并加以称赞，才于1889年重新出版。

在边际效用学说方面，戈森不仅是一位先驱者，可以说后来奥、英、法等国边际主义创建者所使用的全部重要概念均已在他的著作中有所论述。如果他不用数学作为表达工具，而写作技巧能更流畅和更系统些，则边际效用学说将会提早10年就出现。戈森试图给人类社会建立一种像天文学那样的科学的交换规律，但又认为当时要用数学计算出人们满足的绝对量还不可能，而运用几何原理的对比来衡量一些未知量的大小则是可行的。他认定每个人的目的均是要提高他的生活享乐到最大程度。享受有两个特征：一是享乐的量会逐渐减低直到饱和为止；二是同一享乐的重复也有类似的降低，不仅原来的满足更为减低，其持续的时间也较短。根据上述对享乐的分析，戈森引申出三条满足量减低的定律，后来也被称为戈森定律，其要点是：

第一，在一种享乐的场合，其享乐的状况主要取决于重复的次数，以实现享乐的最大总和量。如已达到此最大量，较多次数的重复或较少次数的重复均将减少此享受总量。

第二，当在多种享乐间进行选择而又无足够时间全部享乐时，享乐的最大量要求每一种均须部分地予以享受；即使在这些享乐中最大的一种尚未全部享受完毕，在消费停止的时刻从各方面得到的享乐必须相同。

第三，在前述情况下，仍有增加生活满足总和量可能性的存在，亦即在一种新的享乐（不论其如何小）被发现时，或在一种现有享乐被扩展时。

戈森最不赞成绝对价值概念，认为外部事物之所以对我们有价值，是由于它们能有助于我们达到生活目的，故价值的量是由于事物所发生的享乐或满足的程度来衡量的。任何消费财货的个别“原子”（意指单位）具有很不同的价值，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只有某种决定性数量的这些“原子”才有价值，而超过此点的增加就没有价值。第一个“原子”有最高的价值，每一次的增加只有较小的价值，直到不屑一顾为止。

他把财货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全部可用于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消费财货；第二类均为补足财货，如烟斗和茶叶、煤炭和煤炉等等；第三类为生产财货，其作用是创作消费财货。他认为，要给人们提供满足欲望的财货，就得有“劳作”。所谓“劳作”，是指生产中的痛苦程度或困难。以现代术语表示，即为负效用。从事生产能带来享乐的财货的劳作，并伴随着劳作本身的痛苦，也就是说，不同的财货生产，要用不同程度的痛苦才能获得。因此，劳作是一种产生满足、效用亦即创造价值的活动，但同时也是一种痛苦或负效用，须由它所产生的效用来平衡。当产量达到劳作的效用和痛苦平衡时，价值达到最大量。换言之，在最后单位的痛苦和价值相等以前，生产总是要进行的。超过该量以后，痛苦或负效用大于效用，就不考虑进行劳作了。

由上可知，他已提出了决定价值的边际效用概念，也联系到边际负效用问题，并对财货的分类及其等级做过明确的分析。在所有边际主义的先驱者中，他的分析是较为全面的，只是对市场价格尚缺乏必要的论述。

威廉·罗雪尔

威廉·罗雪尔（1817—1894年）是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高级军官家庭。曾在格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学和政治学，1840年开始在格廷根大学任教。1843年出版被称为历史学派纲领性著作的《历史方法的国家经济学讲义与研究》。1848年转到莱比锡大学任教授，直到逝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国民经济学体系》（1854—1894）、《十六和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说史》（1851—1852）和《德国经济学说史》（1874）等。罗雪尔强调用历史的方法建立新的经济学，即所谓国家经济学。他否认进行抽象理论概括的重要性，把政治经济学仅仅归结为对经济发展过程做纯经验主义的观察和描述。他的国家经济学原理，实际上是在重复当时流行的庸俗经济理论基础上，加上大量历史材料以证明他所谓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无产者，并把他们称之为——原始森林虚弱的无产者。赞同萨伊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服务”的角度引出利息、利润和地租等概念的庸俗观点，并援用西尼尔“节欲论”，把利息说成是资本家“节制”其欲望的报酬。

罗雪尔主张采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他把萨维尼——阿希荷因的历史法学方法引入经济学。按照时间顺序的发展过程研究经济现象。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思想。（1）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从经济方面说明本民族的要求，说明其遵循的目标和获得的成就，说明其目标选择的理由极其成功的原因。（2）罗雪尔认为，近代一切民族问题都有密切的联系，必须对他们加以比较才能把握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本质。而已经灭亡的古代民族的历史则会为他们提供完整的教训，因此必须对古代生活加以特

殊的研究。(3) 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说明一种经济制度在当时为什么和怎样是合理的和有益的，而现实为什么会变成不合理的和有害的东西。他认为历史上还没有对各民族各文化发展阶段完全有益或完全有害的制度。因此不要轻易赞美或诅咒一种经济制度。他还认为，国民经济学应当研究各国人民对于本国经济的思想、要求、感受、所做的努力和结果。

民族主义倾向。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课题就在于表达一国的经济如何、为何由理性变为背理，由幸福逐渐变成灾难。国民经济学除所谓的“单纯地描述人的经济本性和他的经济欲望”之外，只能具体地考察适合于满足这些欲望的各种制度的规律和本质，以及他们所达到的或大或小的成功，他否认经济学的普遍规律，认为古典学派惟一的错误是主张他们有普遍的适用性。他认为一种经济理想不能适用每一个国家人民的不同种类的欲望，正如一件上衣不能适合一切人的身材一样。这样，他就只能看重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经验性规律，只注重收集资料，加以描述，而否认理论概括和抽象分析的必要性。

提出历史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罗雪尔从生物发展的进化观点，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像动植物一样，可以看做一种有机体，有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他要经历幼年、青年、成年和衰老四个时期。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罗雪尔认为，这就是可以从历史描述中发现的自然规律。

他还认为，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受自然、劳动和资本这三种主要经济因素的支配。可以分为自然支配阶段、劳动支配阶段和资本支配阶段。

辩护性观点。他依据“经济发展阶段论”指出，德国社会已经发展到资本阶段，贫富对立的阶段到来了。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生在躯体上的疾病”，必须加以反对。但是社会矛盾又需解决，这就只能实行“人为治疗”。他认为，私有制是不能废除的，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想多享受，少劳动，要是实行公有制，人们对社会总节约效果的关心程度就大大降低了。“人为治疗”的关键就是保护私有制，实行阶级调和。只要政治

上德国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阶级相协调，经济上各阶级利益相协调，就能给德国带来永久的繁荣。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818年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人家庭里，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就学期间对历史和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曾加入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马克思写成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并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担任《莱茵报》撰稿人，后任主编。1843年《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迁居巴黎。1844年创办《德法年鉴》，并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等文章，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是惟一能消灭剥削制度的阶级，工人运动必须与科学的世界观相结合。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见面，并开始了共同的革命生涯。1844年马克思写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尤其从异化劳动角度对上述经济范畴做了考察和分析。1845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迁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又与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历史唯物史观，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1846年，与恩格斯一道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发表《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同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12月至1849年1月，参加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并受大会委托，同恩格斯一起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因此产生了《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的共产主义文献。

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欧洲，在科

伦创办了《新莱茵报》，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失败后，于1849年5月被逐出普鲁士，先到巴黎，后定居伦敦直到逝世。到伦敦后立即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和中央委员会。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和1851年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后，先后发表了《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著名论断。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资本论》手稿的写作，并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在恩格斯逝世后由考茨基整理出版）。1864年9月马克思在伦敦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并成为其领导者。同第一国际内部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首创精神，并很快写出了《法兰西内战》一书，总结公社的经验。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马克思继续以主要精力写《资本论》第二、三卷。同时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1875年写出了《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工人党纲领中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批判。1879年对德国党内苏黎世三人团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和法、英、美等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由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繁重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加上反动政府的迫害，马克思于1883年3月13日与世长辞。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整整花了40年的时间，差不多是用毕生的精力来写作这部巨著的。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从分析商品一般入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资本论》的内容，马克思是依据揭露和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的总目的而确定的。具体而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认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批判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得出关于经济范畴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一思想创造了前提。在19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经济范畴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联系，才会有生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表象（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揭示出资本家阶级剥削与奴役雇佣工人的最本质的阶级关系，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在揭示资本的本质规定和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又从资本的本质和剩余价值开始，逐级逐层地上升到各种具体形态上的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转化形态，最后上升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表面的现象形态“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

劳动价值学说

劳动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和发现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并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指出价值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他考察了价值表现形式以及价值规律的要求和作用，揭示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商品拜物教，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直接从资本主义生产出发，进而分析了由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发展。他首先考察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由于生产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激烈竞争，等量资本要求得到等量利润。随着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加上平均利润。

剩余价值学说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关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生产和分配的理论体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论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来源、本质和特点。同时马克思还分析了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等的产生和本质，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割问题。

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学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集中而系统地论述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关于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和相对“过剩人口”的表现形式；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

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学说

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主要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形态变换、循环和周转，特别是不仅从个别资本角度，而且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考察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条件、比例关系和运动规律，从而在总体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及其历史局限性。在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危机的表现、实质和阶段。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此外，马克思还与恩格斯一道，提出并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形式的学说；关于按劳分配的学说；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自觉利用经济规律和计划管理的学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1820年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工厂主家庭。1842年前往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为他父亲的公司工作。他经常到工厂和工人住宅去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工人状况，参加工人劳动。1844年与马克思同时加入正义者同盟，开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19世纪50—60年代积极参加了领导第一国际的工作并于1876—1878年撰写了《反杜林论》，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担当起领导共产国际主义运动的重担，整理出版《资本论》二、三卷。1889年领导建立了第二国际，同各种机会主义做斗争，使国际工人运动得以广泛发展。1895年逝世于伦敦。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而且还是出色的经济学者，他对一些经济问题也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一些独树一帜的见解。

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乌培河谷的来信》、《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184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神圣家族》（与马克思合著，写于1844，1845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合著，1846）、《共产党宣言》（1848）、《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反杜林论》（1877—1878）、《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等。

恩格斯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历经80年，到19世纪30—40年代才宣告完成。它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体的工厂

制度取代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革命。它使英国率先成为机器大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先进的工业国。18世纪后期，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世纪中叶，德国、俄国、日本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之和还要多，还要大。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以社会化形式使用的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1825年，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爆发了世界第一次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此以后，这种经济危机每隔10年周期性爆发一次。与此同时，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无产阶级的贫困也在扩大，聚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使社会直接产生了两大直接对抗的阶级。一系列由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都为恩格斯提供了丰富的现实资料和科学实践的丰厚土壤。

经济理论

恩格斯广泛阅读、吸收、批判了维拉斯、配第、洛克、范德林特、休谟、李嘉图的经济思想，为科学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上的社会环境与恩格斯科学的实践态度相结合，便产生了恩格斯的经济理论。恩格斯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贡献：

(1) 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对当时突出反映社会经济范畴的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进行分析，他批判指出，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完成以后，资本又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值，虽然实践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甚至利润也分裂为利息和利润本身，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达到顶点。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

制，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就会消灭。

(2) 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人口过剩的问题。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是由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人口过剩一方面是在资本主义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这一理论思路，十分接近于马克思后来完成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基本框架。

(3) 恩格斯对当时英国经济危机中价格机制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经济危机中，尽管都出现了价格波动的现象，但是，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价格波动引起的，价格波动实质是金融市场的总的状况决定的，价格机制的作用能加深经济危机的程度，但却不是引起经济危机的根源。恩格斯还认为经济危机中劳动群众生活必需品匮乏的现象不是由于生产得太少了，而是工人的钱——可支付的能力太少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所特有的生产相对过剩这一实质。

(4) 恩格斯研究了原始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点，私有制的产生和原始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各种形式，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学说。并研究了氏族制度的解体 and 国家的产生、私有制必然灭亡的规律，指出卡特尔、托拉斯垄断组织出现的巨大意义，分析了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和毁灭的客观必然性。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5) 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但是，这一特征以何种具体形式实现，却是生活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解决的问题。

(6) 恩格斯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依他所述，在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控制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对于小农，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对于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的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

已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使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看到合作的大规模农场的优越性，而且也会使某些大农场主看到这些优越性。

(7) 恩格斯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他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国有制的大量涌现。它表明，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惟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惟一先决条件。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地位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替代，指出，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活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8) 恩格斯充实了政治经济学对象和特点的分析。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但它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和消费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的这种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还尚有待于研究和创造。而研究适合这一切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必须依赖于研究某一特定社会经济规律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显示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与其他自然科学特点不同的人文学科。

恩格斯以独特视角对这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刻敏锐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历史前瞻性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有重大意义，对我们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多有启迪。

莱昂·瓦尔拉斯

莱昂·瓦尔拉斯（1834—1910年）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创始人，19世纪70年代初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边际革命”的倡导者之一。他出生于法国。其父奥古斯特·瓦古拉是法国皇家卡茵学院哲学教授，对经济学颇有研究，著有《财富的本质与价值的来源》（1831）等书。瓦尔拉斯1845年进巴黎矿冶学校，因志趣不合辍学。1858年夏，他终于听从父亲的劝导，立志献身于经济科学。在以后十多年间，他一边在父亲指导下自修经济学，一边从事各种职业，如记者、编辑、铁路职员及合作银行经理等。

瓦尔拉斯的第一部论著是1859年在巴黎发表的《蒲鲁东批评》，当时他已确信可以利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理论。1860年，他在瑞士洛桑“赋税会议”上宣读的一篇论文获奖。1870年他被瑞士洛桑大学聘请为新设的经济学讲座教授；1873年完成成名之作《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于1874年和1877年分两部分出版。瓦尔拉斯鉴于早年在法国不为同行所尊重的经历，在《纲要》付印之时，萌发了一个“国际化”设想，即在国际范围内寻求其学说的支持者和接受者。他通过多种方式，先后与英国的杰文斯、艾奇渥斯、维克斯蒂得和马歇尔，奥地利的门格尔、庞巴维克以及法、德、意、俄等国一大批新经济学家建立联系。这一国际化行动，对于边际学派的确立与扩充以及边际经济学最终取代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英法传统经济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92年，瓦尔拉斯推荐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接替其经济学教授职位。瑞士学派或洛桑学派开始形成。退休后，他在洛桑附近的克拉伦斯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与写作，并作为名誉教授与洛桑大学保持联系。1896年、1898年，他的《社会经

济学研究或社会财富分配生产理论》先后出版。至此，他早年写作一部三卷本的关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学方面著作的愿望得以实现。瓦尔拉斯在瑞士度过了近 40 年的学者生涯，却一直保留着法国国籍。洛桑大学为表彰他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贡献，特地树起一座纪念碑，上面铭刻着“经济均衡”几个大字。

瓦尔拉斯在政治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认为，生产要素定价意义上的分配，从属于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生产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分配，以及由此引起的贫富差别、公平与不平等，与社会伦理道德有关。他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设计了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在其模式中，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土地带来的收益归全社会享用；允许由知识所有权引起的收入差异存在；为保证全社会的利益，国家必须对银行、股票市场、劳动力市场实行管制和限制，消除垄断，充分发挥自由竞争机制的作用。他还提出一整套实现公平原则的租税体系。在这方面，瓦尔拉斯深受约翰·穆勒、戈森和亨利·乔治等人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纲要》是瓦尔拉斯最主要的代表作。该书中建立的纯粹理论经济学或一般均衡理论，是他的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基础。全书共分五篇。其主题是研究在自由竞争场合，各种商品包括生产要素及劳务等的价格同时形成的条件。这一理论的主要特色，在于以边际生产率理论尤其是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展开其一般经济均衡的分析，并应用数学方法加以表达。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及研究方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效用或最大满足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把理论经济学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之内，强调消费、效用与需求，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序的理论体系，并以边际原理论证经济人所应遵循的法则，从而与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一道，共同发起了 19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他的一般均衡分析，包括了局部均衡分析，开创了现代经济均衡分析的先河；他极力倡导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理论，成为与杰文斯

等人齐名的数理学派和数理经济学的创建者。

瓦尔拉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分为三个部分，各有其研究的范围和标准。财富理论或交换价值理论属于自然科学，其标准是合乎事实；工业与商品理论是应用科学，其标准是有用；财富分配理论是道德科学，其标准是正义或公平。上述分科是从社会财富这一范畴中直接引申出来。所谓社会财富，指所有具有稀缺性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它们既对人们有用而且数量有限。由此带来三个结果：它们是可以占有的；它们是有价值和可以交换的；它们能够由产业加以生产。因此，对社会财富的研究须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

威廉·杰文斯

威廉·杰文斯（1835—1882年）是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出生于利物浦一个制铁工程师家庭。15岁进伦敦大学学院学校学习，一年之后，进入大学学院学习化学和植物学。1853年至1859年辍学去澳大利亚一造币厂任检验师。1859年返回英国继续在原校攻读文学士和硕士学位。1863年在欧文斯学院（后改名为曼彻斯特大学）取得助教职位，三年后担任逻辑道德哲学及政治学教授。1875年转任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1882年杰文斯在游泳时不幸淹死，年仅47岁。

杰文斯约从1858—1859年开始对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及社会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留下许多著作。在他所称的“纯经济学”方面主要有《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在应用经济学方面有《黄金价值的剧烈下降及社会影响》（1863）、《煤的问题》（1865）；在社会问题方面有《国家与劳工的关系》（1882）等。

在西方学者看来，杰文斯的主要成就是独创了边际效用需求学说，据此重新解释了交换价值或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说史所谓“边际革命”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两位即门格尔和瓦尔拉），他极力倡导数学方法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运用，成为经济学数理学派的创建人之一；他试图将纯经济理论与统计材料结合起来，为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杰文斯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导论：经济学的方法论

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如供求规律考察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数量及其价格的关系，因而它的性质是一门数学科学；借助于数学符号及数学推导能够比文字更为便利地处理经济学中的量与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快乐与痛苦理论

杰文斯说，在计算快乐和痛苦的量时，应考虑感情的强度、持续性、不确定性及远近性等因素。

效用理论

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理论必须从正确的财富消费及效用理论出发。因为，人们为了消费才去劳动和生产，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决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他认为，商品是可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物理对象或行为，商品能够为人服务的抽象性质称为效用。效用不是物固有的属性，其产生与人的需要密切相关。一商品的各部分的效用不会是相等的。杰文斯把现有商品量中那个极小的或无限小的最后增量或可能增量的效用程度，定义为最后效用程度，其变化的一般法则是，随商品量的增加而递减。这就是杰文斯所谓的最后效用程度递减原理。他认为，经济学理论就是设立在这一原理上的。

交换理论

杰文斯认为，交换在效用的增加和劳动的节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它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他指出，经济学的市场，是指两个以上的人，经营两种以上的商品，他们的商品存量、互相交换的意志及交换率为一切人所知。即无差别法则。他认为，交换比率一词不能完全表明通常价值一词的涵义。即使无交换率的概念，人们对于一物仍然有估价的意思。他批评劳动是价值源泉的论断与事实不符，所以不能成立。他说，劳动在大多

数场合是决定价值的条件，其过程是：劳动或生产费用决定供给；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交换率或价值。劳动本身是一个变量，其价值由其生产物的价值来决定。

劳动理论

杰文斯认为，劳动是经济学研究的过程的开端，消费是其结局与目的。经济学是要讲明人们如何以最小可能量的劳动满足其欲望的问题。

地租理论

杰文斯指出，麦克库洛赫和詹姆斯·穆勒清楚地表述了另一种意义的地租起源理论。将一定量的劳动或资本投入同一部分的土地中，但生产物却不和投入量成比例增加，而是以递减的比例增加，最后的投入部分，必须提供普通资本的普通利润，其他各部分投入所提供的普遍利润以上的剩余，皆成为地租。

资本理论

他认为，经济学不仅是交换或价值的科学，而且是资本的科学。因为，资本的运用和交换的过程一样，都能增加效用总和，但即使没有交换的利益，仍然可以有资本的利益。

关于工资和利润

杰文斯指出，在工资与利润的关系上，现行经济学将产业的全部生产分为地租、赋税、利润和工资，然后将赋税和地租去除，得到单一的公式：生产物 = 利润 + 工资，并由此引出工资若上升利润必下跌的结论。他认为，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两个未知数却只有一个方程式。实际上，生产物的量是一个变量，而利润是首先有待决定的部分，利润又分解为监督的工资、风险的保险费用和利息。

古斯塔夫·施穆勒

古斯塔夫·施穆勒（1838—1917年）是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新历史学派创始人，出生于官吏家庭。1860年毕业于杜宾根大学。毕业后曾任哈勒大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864—1872）、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72—1882）和柏林大学教授（1882—1913）。1884年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当选为普鲁士议院议员。主要著作有：《关于法和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1875）、《一般国民经济学原理》（1900—1904），1881年起主办《施穆勒年鉴》，并于1911年完成了《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和方法》一书。他认为经济组织不外是由经济法规和伦理所规定的生活秩序，经济现象既是自然的技术关系，又是伦理的、心理的关系，国民经济学是一门介乎应用的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的科学，主张运用历史统计方法，对个别经济历史进行调查研究的，建立历史的伦理主义的经济学。1873年创立社会政策协会，鼓吹阶级调和，提倡社会改良。由于参加协会的成员大都是教授，他们的主张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施穆勒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

否认客观经济规律

施穆勒极力否认社会存在普遍的客观经济规律。他提出，国民经济由各种因素所构成，除自然的、技术的因素之外，还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因素，这些因素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并相互影响和制约，因此，“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说到底是没的，也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庸俗的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59页）他认为，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努力收集大量的历史和当前的资料后，运用

历史归纳方法进行分析整理，才能得出若干应有的结论。他主张继续采用旧的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作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法，但他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他不仅否定普遍经济规律，而且否认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规律性。为了对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经济状况进行专项研究，他用历史统计方法取代旧历史学派的历史推理方法，满足于搜集各个行业和个别城市的历史统计资料，而不做任何理论分析和概括。施普勒否定客观经济规律存在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他不仅否认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更重要的是否定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必然性。他所鼓吹的历史归纳法及其历史统计方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他和科学的历史方法毫无共同之处。他在经济研究必须搜集各种资料和研究个别制度的幌子下，否定科学的抽象演绎和理论概括，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任何科学的解释。

强调心理因素

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解，施穆勒竭力强调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所有经济范畴，如劳动、分工、交换等都是心理和道德的范畴，一切经济现象都受到心理和伦理道德的制约。施穆勒的这一谬论完全颠倒了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他的目的在于说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需要阶级斗争，只要用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去教育劳动人民，并通过国家的恩赐措施就可以实现。

强调国家的作用

施穆勒竭力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他认为，人们之间有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道义的结合，国家就是这种道义结合的具体结构。他强调，国家是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国家权利应该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因此，他竭力主张强化国家的职能和作用，扩大资产阶级国家对社

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鼓吹让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政策创造出国民经济的统一体，建立社会的和谐。

鼓吹社会改良

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革命运动，鼓吹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是施穆勒经济学说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劳资之间的对立不是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是劳资间思想感情有差距，应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道德教育，以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他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缺陷和德国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由国家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把这些改良主义的政策冠之以“社会主义”的称号自称为“特种社会主义”。当资产阶级自由派嘲讽这些政策主张为“讲坛社会主义”时，施穆勒及其追随者表示欣然接受，并以此来冒充社会主义来欺骗工人。事实上，“讲坛社会主义”绝不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他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其政治目的，不过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削弱德国工人运动，维护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利益。

卡尔·门格尔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年）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1840年出生于加利西亚的纽—桑迪兹（当时属于奥地利，现为波兰领土）。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门格尔继承父亲的衣钵，先是在维也纳大学，后转学至布拉格大学研修法律和政治科学。1867年从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门格尔当了一名财经记者，后任职于奥地利国务总理办公室的新闻机关。1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讲师，三年后晋升为专职教授。1876—1878年，任奥地利皇太子的私人教师，陪同鲁道夫王储遍访欧洲各地。1879年，门格尔返回维也纳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从此以后开始了学究式的经济学家的生涯——将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教学和写作。1900年，当选为奥地利议会上议院成员。1903年退休后，从事研究和写作，身后留下了25000多卷藏书。

门格尔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1883）、《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1883）、《德国历史主义的错误》（1884）等；此外，还写过《资本理论》（1881）、《货币》（1892）两篇论文。

门格尔的第一大贡献是关于价值理论，即效用是价值的起源以及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门格尔从认定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开始，主张价值由主观因素（效用或需求），而不是客观因素（生产成本或供给成本）决定。在他看来，价值源于人类需求的满足。人类需求创造了对商品的需求；人类需求成为经济交易的驱动力，有助于决定价格水平。同时，既然人类需求大于能够满足需求的商品，人们将在所有可供选择的商品中

做出理性抉择。门格尔意识到，当一个人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多时，购买每增加一个单位数量，给予消费者的满足程度都降低。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商品，当人们消费增多时，都将遭遇边际效用递减。

尽管门格尔发现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以表格的形式用数字进行了说明，但未就每种类型的商品进行举例说明，也并不清楚表中数字所实际衡量的内容。但门格尔假设的这些数字能够衡量相对需求，或消费不同商品所得到的满足。门格尔还明白个体在考虑消费什么或怎样消费时将如何做出决策。既然消费者可供支配的收入有限，个体将首先购买那些能满足较重要需求的商品，形成主观价值理论。他认为，所有产生主观满足的行为都是生产性活动，贸易也具有生产力，因为人们只有在感到获取的商品能赋予自己的效用比放弃的商品多时，才会进行交易。同时，推翻了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门格尔认为，商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劳动力的数量或其他必要的生产资料，也不是产品复制的必要数量，而是我们所感知到的这些满足的重要程度。

门格尔的另一大贡献是涉及经济学方法论。根据门格尔的观点，既然价值来自于个体的感知，那么经济学分析必须从研究个体开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地位开始为人所知。

门格尔认识到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也具有价值，因为它们间接地满足了需求；这些要素是生产人们直接需求的商品所必须的。为了确定某个要素的实际价值，应撤回一个单位的要素（例如一个工人），然后观察产出的损失。这部分损失的价值就是那个工人增加的价值，代表该工人提供给消费者的满足程度。这样每个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都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每个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要素的收入或报酬将取决于该要素所创造的预期价值。

在方法论问题上，门格尔认为理论的发展超前于资料的积累；正确的科学方法应包括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特征或经济变量之间的必要联系（例如某商品降价促使人们去购买更多的商品）。

门格尔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知识来自于先验，或超前于现实经济生活的经验。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包括研究个体偏好（或需求），以及解释这些偏好如何导致了值得注意的现象，如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格。门格尔对个体的强调，认为我们必须响应个体的主观评价来解释经济世界的主张，使他成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是近现代西方影响最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之一。由于马歇尔曾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所以他和他的门徒被称为“剑桥学派”，又因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马歇尔的经济理论看做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续和更新，剑桥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而马歇尔亦被看做是“新古典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

马歇尔于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英国西部克拉芬地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幼年喜爱数学，中学毕业后就读于牛津大学，后转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数学，1865年毕业后留任该院研究员，1868—1877年任该院道德科学讲师，讲授政治经济学。在此期间，马歇尔深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第一原理》的影响，曾于1868年赴德国研究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相接触。回国后，他又阅读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些都促使他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1877年转任布里斯托尔（Bristol）大学学院院长兼任经济学教授。1883—1884年，他接替牛津大学逝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A.·汤恩比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讲师和研究员，1885年返回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期间创立了剑桥经济学院，1908从剑桥大学退休，专门从事研究和写作。1924年去世。

马歇尔的主要著作有：《产业经济学》（1879）、《经济学原理》（1890）、《产业与贸易》（1919）、《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等。其中《经济学原理》为其重要代表作，该书兼收并蓄，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折衷主义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因此，该书一经出版就被认为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而他本人也获得了“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盛名。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说是集历史上资产阶级经济学之大成，正如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以英国古典传统的经济理论为骨干，吸收、综合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流派的学说，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独树一帜，对当代资产阶级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马歇尔的经济思想以人的主观心理因素为基础，这从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可以反映出来。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行为、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他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由“满足欲望”和“避免牺牲”这两个动机支配，并用这两种心理动机来解释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而为了解决心理动机不能解释的现实社会问题，他又引进了渐进的改良主义，其理论依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认为，生物界的发展规律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社会发展只有渐进的量变，没有突变和飞跃。因此，他用“自然不能飞跃”作为《经济学原理》一书的题词，并且说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

马歇尔在方法论上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运用所谓“连续原理”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上说：“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这与他的渐进的改良主义是吻合的，因为经济进化的渐进性，他认为经济概念乃至经济现象间都存在着连续的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别。第二，运用“边际增量”分析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在连续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对经济现象进行本质研究时，“增量”的关系比“总量”的关系更重要，他在数学中独立地运用效用的“边际增量”来说明人对一物的需求。以后他把这个边际增量分析运用到他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甚至推广到其他经济问题上。第三，将力学中

的均衡概念运用到经济学中。他认为均衡是一种相反力量的均衡，有动态和静态之分，前者指生物意义上的均衡，后者指力学上的均衡，而静态均衡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他依此来说明各项经济指标的数量决定，将这些决定尤其是价格和分配额的决定归结为相反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而形成的均势。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包括需求理论、生产理论、均衡价格论、分配论等。

均衡价格论

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和基础。马歇尔在假定其他商品价格和货币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一个商品均衡价格的形成。按照马歇尔的说法，均衡价格就是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或供给与需求的价格在市场上达到均衡状态时的价格。他认为，二者的一致是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背离，就会通过供求量的变动，使市场价格恢复到均衡点。马歇尔在分析均衡价格时，引进了时间因素，他把市场价格分为暂时（一天或几天）的市价、短期的正常价格和长期（一年以上）的正常价格。他认为，时间长短不同，对于市场上供求双方的较量趋于均衡的情况是不同的，因而它们对均衡价格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需求理论

所谓需求，在经济学中指消费者的需求，于是效用理论成为需求理论的出发点，而马歇尔的需求理论出发点则是人的欲望。他认为，需求是欲望的满足，而人的欲望是由效用来满足的。他间接地用人们因欲望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即需求价格加以衡量，从而将需求转化为需求价格，用边际需求价格去衡量边际效用。同时，马歇尔认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而取决于边际效用的需求价格也是递减的，这样，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马歇尔在分析需求时，又提出了“需求弹性”的概

念，用以衡量价格下降或上升一定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增加或减少的比率，也即衡量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马歇尔第一次用代数和几何图形对需求弹性作做严谨的表述，经其阐述和传播，需求弹性至今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

生产理论

马歇尔的生产理论就是他的供给理论。他用生产费用论来说明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每个厂商在生产时都根据“替代原理”用一种生产要素（生产方法）替代另一种生产要素（生产方法），力求使生产费用最小化。马歇尔认为，短期边际生产费用一般随产量增加而递增，故供给与价格的关系是：价格高时供给量大，价格低时供给量小。价格变动与供给量变动的关系可以用“供给弹性”来表示。马歇尔认为，商品供给弹性的大小与时期长短有关。供给在短期内不易变动，故短期供给弹性较小，长期供给弹性较大。在分析行业均衡时，马歇尔引入了“代表性企业”概念。根据定义，行业产量的长期根据价格等于代表性企业在该产量水平处的平均成本，因此，可以把全行业产量看做是由固定数目的代表性企业生产的，代表性企业的平均成本与规模随行业产量的变化而变化。

分配理论

马歇尔的分配理论是他的均衡价格论的延续，是均衡价格论在分配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他认为，分配问题就是国民收入如何分割为各生产要素的份额问题。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因此，供求论也成为马歇尔分配论的一般原则。相应地，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就是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工资是劳动的需求（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供给（取决于养活、训练和维持有效劳动的费用和对劳动的“负效用”）均衡时的价格。利息是资本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等待”）均衡时的价格。由于土地没有生产

费用，而且它的供给量是不变的，因此地租是由土地的需求状况从而由它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它是农产品价格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至于利润则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正常的利润是产品长期供给价格的组成部分。

虽然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存在不少缺陷，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仍是杰出的。至今，他的一些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仍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继承，在基本理论问题上，马歇尔的学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着深远影响，他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直至今日仍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约翰·克拉克

约翰·克拉克（1847—1938年）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出生于工商业者家庭。1872年毕业于安默尔斯特大学，随后留学德国，成为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克尼斯的学生。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就曾受教于他。他还一度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893—1895）。自189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达30年之久。

克拉克是美国理论学派的开创者。19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家大都只限于论述和研究具体经济问题，对基本理论的探讨甚为忽略。早期的克拉克也暴露出历史学派的若干特征和观点，但他后来率先重视价值论和分配论等基本理论的研究，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

克拉克的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哲学》（1886）、《财富的分配》（1889）和《政治经济学要义》（1909）等。

《财富的分配》是克拉克的代表作，该书中心内容是阐述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克拉克承袭萨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庸俗思想，又把报酬递减律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到一切产业部门，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各自决定工资和利息的分配理论，据此宣扬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各有其源、公平合理因而谁也不剥削他人的荒谬思想，为资本主义辩护。该书最先明确区分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该书创立的社会效用论，试图修正和补充奥国学派的价值理论，当时也为不少著名美国学者所信奉。该书中的主要观点有：

财富的分配是极重要的经济问题

包括研究分配论的宗旨和若干特点以及关于分配所引起的争论。克拉克发表了如下观点：（1）有一个支配财富分配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它将社会收入分为劳动、资本和企业家职能的收入，即工资、利息和利润。每个生产职能应得的份额，都以其实际生产量来衡量。（2）将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与其是否受剥削区分开来，他们的福利取决于收入的多寡，而是否受剥削则看有没有得到自己生产的全部财产。（3）分配论不直接决定每人应得多少。经济学只研究怎样把全部社会收入分为若干种性质不同的收入以及决定它们的标准。（4）分配还可做纯粹伦理上的讨论。“各尽所能，各得所需”被某些社会主义者看做是最理想最公平的分配方式，其实它将侵犯财产权。（5）必须保证人们根据所有权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否则，社会组织迟早要崩溃。

经济学的三个自然部分

克拉克认为经济学传统四分法有一定的缺陷，他认为，传统经济学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作为四个部分的界限并不清楚，因为生产财富的过程就包括交换和分配在内。他将经济学分为三个自然部分。第一个自然的部分介绍基本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它们不依靠经济组织而起作用。第二个部分讨论经济学的社会规律，研究的是静态社会的现象，即依靠社会组织而不依靠社会进步的力量。最后，还须研究改变生产方式和影响社会结构本身的各种变化的问题，即动态社会经济学。这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理论在进入研究动态现象后才算是完整的。

最后生产力规律决定工资和利息的标准

（1）识别劳动生产和资本各自特有的产品。克拉克认为，自然的、正常的或静态的价格，就是成本价格或没有利润的价格，它们使各个产业中每单位劳动和资本的报酬都相等。在经济生活中，产业靠劳动和资本的合作，因此区分劳动的全部产品与产业

的全部产品非常重要。这样，要完全由劳动产品来确立工资标准，必须排除资本、土地等因素创造的价值，并且使劳动产品可以单独衡量。他提出，这样树立的工资规律将是：边际工人的收入等于自己的产品，而所有同等能力的工人则与有相同能力的边际工人的收入相等；前者决定工资的自然标准，后者决定市场标准。

(2) 最后生产力决定工资和利息。克拉克认为，人和资本货物一样会消灭，但劳动和资本则同样永久存在。作为两个永久的生产因素，劳动和资本一定要适应彼此的需求，从而变更自己的形式。在一定数量的资本下，倘若使用的劳动有所增减，则资本的形式便要变更。同样，一定量劳动随资本的增减也要改变形式。他强调，工资和利息由劳动和资本的最后生产力所决定，而研究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就须应用国学派关于一连串同种物品的价值都由最后一件的效用来决定的原则。

强调静态和动态的分析

其静态分析基于以下四个假定：一是效用递减定律继续发挥作用。二是生产也在报酬递减条件下进行。三是将财货区分为现在消费的财货和为创造未来财富而运用的财货，又将后者理解为资本，并容许有足够资本财货流量之存在。四是生产也要同消费一样须以边际效用原则为指导，这样才能将生产和消费的分析统一起来。在上述四个假定下的静态分析是不存在利润的，工资和利息仅是劳动和资本的正常报酬。他将土地投资也看做是资本，故将地租包括在利息之内。他所谓动态是指五种变化：其中四种是人口、资本、技术和消费欲望的增加和改进，第五种动态变化是工业单位的兴败。动态分析是历史的和归纳的分析，必须经过历史、经济学家们的长期和科学的劳动才能形成。而静态分析则是演绎分析，其规律是可以较早形成的。

克拉克虽提出并强调静态和动态的区分，而其全部理论仍以静态分析为主。关于动态，只论述了其研究的必要性，未发展成理论。就静态和动态的区分而言，也不够严格和明确。现代学者

认为静态条件之一的常数报酬，他就未予以重视。又如对静态和静止状态”之不同，也常含混不清。

维尔夫雷多·帕累托

维尔夫雷多·帕累托（1848—1923年）出身于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在大学时代攻读工程学和数学，毕业后任铁路工程师及经理职务多年。因投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他在1876—1892年间曾发表过许多经济论文，并获得相当声誉。后来在经济学家潘塔里阿尼（MaffeoPantaleoni）的影响下，从事纯经济理论的研究，受到瓦尔拉斯赏识，于1893年继瓦尔拉斯之后任洛桑大学教授，为建立洛桑学派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代表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义》（1896—1897）、《政治经济学提要》（1906）。

帕累托的思想别具一格。在政治观点上，无论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法国天主教派，乃至法西斯主义者，均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也不能把他完全归入哪一学派，即使就他所继承并建成的洛桑学派而言，除一般均衡论基本概念外，许多理论观点同瓦尔拉斯大有出入。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在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福利理论两方面，其中有不少观点后来曾被称为“定理”者至少有六七种之多，尽管这些“定理”有的受到批评和有的由后来人改进，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一生中能提出这么多“定理”却是罕见的。

纯经济理论

帕累托的纯经济理论可分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理论两大部分。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上，他首先将经济意义上的效用同伦理和其他意义上的效用区别开来。帕累托明确宣称：效用可衡量的原理是没有根据的，应彻底否定基数效用，认为价值理论必须另找它赖以建立的基础。这样，帕累托采用埃奇沃思无差异曲线分

析作为他的价值论的出发点。他把埃奇沃思从可衡量的效用发展而成无差异曲线视为既定，然后用这些曲线的位置高低去比较消费者的偏好程度，形成序数效用理论。经过市场客观经验的观察，人们虽不能确定两种商品中任何一种的效用有多少，但两者中哪一种效用较大，则是可以确知的。无差异曲线分析工具，经过帕累托的改造，就不考虑其原有效用的涵义，而把经济均衡建立在偏好尺度这一确定的基础上。他的这一创见，连后来欣赏他的理论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无差异曲线本身就是根据效用大小设计而成，只要运用此分析工具，就不能排除赖以建立的基数效用的原意。无论如何，帕累托在无差异曲线方面所迈出的这一步的确是很大的，给此工具之运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生产理论是帕累托的极重要理论之一，也是其最为晦涩的一部分，他不接受当时流行的边际生产理论，试图另创一个生产理论以为代替。首先，他指出，边际效用论者的生产理论，只分析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研究在获取财货时所遇到的“阻碍”的性质。而所谓“阻碍”，包括的内容很广：如商品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时，当事人固定的嗜好即为阻碍；生产一定商品必须使用别的商品又是阻碍；需要某种商品的地点和时间却没有此种商品也是阻碍；最后还有来自生产组织方面的阻碍。他列举这些含混的所谓“阻碍”，是为了提出一些较为客观的生产概念，以代替为消费主体而生产的边际效用概念。他强调：生产是把一种财货改变成不是为生产者本人，而是为其他主体而生产的另一种财货。这等于说，客观的生产是为商品而生产。这本是个正确的观点，可是，在研究如何解决“阻碍”（生产）问题时，他又利用无差异曲线这一工具，用它来反映利润水平，以区别消费者无差异曲线所表现的一定效用水平，并将各种利润水平联结起来，形成一条“完全变化曲线”。此曲线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曲线上方反映正值即利润，下方反映负值即亏损，而曲线本身即反映出利润等于零的状态。总结起来由消费者无差异曲线所形成的“交换曲线”，以及由生产者无差异曲线所形成的“完全变化

曲线”，两者的交点即为均衡价格。帕累托的生产理论在形式上保持着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式，而实质上是采用了马歇尔的消费需求 and 生产成本相结合的供求平衡论，只是对供给和需求双方的曲线均由无差异曲线图所组成。

在他的纯理论中，其收入分配理论也值得一提。他搜集了19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经过指数整理后，发现这些国家的社会收入不平等情况是基本稳定的。他由此得出结论：通过收入重分配的任何方式，以使收入均等的努力是没有作用的。后来这一发现被定为“帕累托定律”，成为反对社会改革者的理论武器。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定律表示支持、怀疑或否定的都有。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其答案很简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使收入均等化的有效办法，帕累托定律虽有某种合理性，但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收入的平均分配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社会福利理论

帕累托以序数效用和无差异曲线分析为基础，发展他的社会最大满足原则或所谓最优状态。要研究此状态，就必须有用来评定它的标准和规范，以及用来实现它的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帕累托的社会最大满足原则的形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讲义》一书中，他对在自由竞争下能否实现社会最大满足尚无确定的论述，而在稍后的《教程》中已较为深入而确定，在后期的有关社会学著作中对社会福利最大化涵义又做出了进一步分析。

关于达到社会最大满足的条件，他指出：“我们看到，要取得一个集体的福利最大化，——如某些分配标准为既定，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标准去考察哪些状态能给集体的各个人带来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来考虑任何一种特定状态，并假定在与各种关系不相矛盾抵触情况下做出一个极小的变动。如果我们这样做以后，所有各个人的福利都增加了，显然这种新状态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利；相反，如个人福利均减少了，这就是不利。——但是，另一方面，如这个小变动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并使别人的福利减

少，这就不能再说做此变动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因此，我们把最大效用状态定义为：做出任何很小的变动不可能使一切人的效用，除了那些效用仍然不变者外，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

用另一种方法表达：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情况的改变使有些人感到好些而不使至少一个别的人感到坏些，才算是社会福利的增加。这就是后来新福利经济学中常提到的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ParetoOptimum）或“帕累托规范”（ParetoCriterion）。但是，此时帕累托尚未明确肯定这种最优状态是指某种单一的状态，或是指某一幅度内的若干种状态。直到他的后期著作才清楚地区分出两种类型的效用最大化状态：一种是单一的“全社会效用最大化状态”，另一种是有无限的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点，亦称为“社会的许多效用最大化”状态。这种区分，对政府选择何种政策，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有极大的关系。假设在一个很富裕但其成员的收入极不平等的社会中，政府就应该采取使全社会的效用最大化政策；如在一个贫困而有近似均等收入的社会中，政府就应采取社会的许多效用最大化政策。

帕累托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纯理论分析，成为以后三四十年中福利经济研究的中心课题，并发展出各种社会福利函数，有些人加以补充，提出了所谓补偿原则，甚至有人创立了次优理论。又由于许多计量经济模式须以帕累托的最优化原则为基础，故帕累托之名还经常被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及。

欧根·庞巴维克

欧根·庞巴维克（1851—1914年）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奥国卜龙。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1875年到1877年在德国海德堡、莱比锡及耶拿大学跟随历史学派人物克尼斯、罗雪尔和希尔德布兰等人学习经济学。1880年任维也纳大学讲师。不久，受英斯布鲁克大学聘请任教授。1889年入奥国财政部任职。1895年起三度任财政部长。1904年离职，去维也纳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11年被选为奥地利科学院院长。

庞巴维克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与资本利息》（1884—1889）及《马克思体系的崩溃》（1896）。前者是两卷本的著作，第一卷题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本以利息理论为专题的经济学说史，对于从古希腊起直到和他同时代经济学家们的各种利息理论都有所论述和批评，实质上它主要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独创了所谓时差利息论。这一卷是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的正面对论。《马克思体系的崩溃》一书，则企图利用已被马克思科学解决了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矛盾，攻击《资本论》第三卷同第一卷自相矛盾。

按庞巴维克的说法，《资本实证论》重点是利息理论，而利息由资本产生。资本和资本理论可出现在生产领域里，也可出现在分配领域里。在生产领域，资本被当作生产要素或工具；在分配领域，资本被作为利息来源。

在价格理论方面，庞巴维克做出了重要贡献。庞巴维克清晰而周详地分析了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关于客观价值或购买力的阐述，把门格尔和维塞尔未能分析清楚的主客观价值的关系调和起来，使奥国学派的价值理论构成完整的体系。

为了把依存于个人的主观评价同市场的客观价值（价格）结合起来，庞巴维克提出了有名的“边际对偶”（marginal pairs）理论。他从一对孤立的买者和卖者出发来分析价格的决定问题。在此场合，价格将以买者对商品的主观评价为最高界限，卖者的主观评价为最低界限，并决定于两者之间的某一点上。接着，庞巴维克又分析许多买者间的单方面竞争，此时的价格必然确定在他的估价（愿多付的价格）和最能干的竞争失败者的估价之间。此种情况在通常的拍卖场中就是这样进行的。类似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许多卖者间的单方竞争。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庞巴维克又扩展到许多买者和许多卖者间的双边竞争，从而提出所谓“边际对偶”概念。

奥国学派的追随者推崇庞巴维克的这一价格理论，认为它成功地将一个纯主观的价值理论和纯客观的交换价值联系起来。它的特点在于通过边际对偶分析，确认了两点：一是每一个市场价格本身都是一种边际价格，二是价格为主观评价的产物。尽管从科学的价值理论考察，这一分析是微不足取的，但从主观价值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庞巴维克的确迈出了极为突出的一大步。

庞巴维克的另一重要理论是他的资本利息学说。关于资本和利息的关系，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未做过深入的分析，一般为资本有其生产性，获得利息为理所应当，未进一步探讨与此产生有关的问题。庞巴维克第一次提出“迂回生产方法”或“无回生产过程”的理论。他举例说，荒岛上的鲁滨逊可以直接双手捕鱼，也可先结渔网，然后用渔网捕鱼。显然用渔网捕鱼较好的生产方法，有其技术优越性。由于使用生产工具愈复杂，其优越性就愈大，庞巴维克就用这一事实，论证资本的生产性能。他进一步指出：“迂回”方法必然较直接方法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方法愈迂回，花费的时间愈长，要使迂回生产的时间延长，就得增添更为复杂的生产设备，也就是增加资本。因此，要在生产中使用资本就须考虑时间这个因素。他的这些观点以往虽曾经出现过，但只在他的手中才得到系统论证，并赋予“迂回生产方法”这个名称。

弗里德里希·维塞尔

弗里德里希·维塞尔（1851—1926年）是奥地利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塞尔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1874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专业。1872年偶然读到门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遂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他历游海德堡、莱比锡等大学，寻找名师，得到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等人指导，专攻经济学。1874年大学毕业后在财政部门找到一个职位，但不久便辞职了。1883年开始任维也纳大学的讲师，第二年受聘为布拉格大学外教授，1889年升任正教授。1903—1922年，他受门格斯举荐，接替门格斯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1917年以终身议员的资格任上议员，并在奥匈帝国的最后两届内阁中任商业部长。1922年退休。

维塞尔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经济价值的起源与基本规律》（1884）、《自然价值论》（1889）、《社会经济学》（1914）等。

维塞尔在前人的基础上精心思考组织他的“新价值理论”，其成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本、也是惟一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经典学术著作——《自然价值论》。他首先提出价值的本原问题。他认为，效用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稀少，因而价值的大小与稀少成比例。财物的用处或效用是因为能满足人类欲望的需要，财物能满足人的需要而又有限，所以就具有价值。需要或欲望随着消费次数的增加而递减，物品的效用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也随之递减。维塞尔认为，社会个人根据财物对自己的有用程度来估价单件商品的效用，它们的总和构成这批财物的总价值。但是，每个人估价的单件商品的效用总和，与国家根据社会需要来估价整批财物的效用，二者的差异非常大。批量财物的社会效用大于社会每个人分件估价这些财物的效用总和，而且

大很多。这就是维塞尔的“价值的一般定律”。

维塞尔称价格或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值的形式。价格在存在许许多多的卖主和买主相互竞争即完全竞争的情况下，由当时的边际买主的最高价格决定。同时交换价值或价格也是主观的。价值是人对财物满足自己需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由价格、货币表现的价值实际上也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评价。这样，持有货币的人就要预计能用它获得多少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所以，对货币价值的估计，完全是一种主观行为，是对效用的主观评价没有区别。维塞尔称之为主观的交换价值或货币的“个人等式”。交换价值或价格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由于交换价值或价格既取决于效用，又取决于购买力，其后果之一是生产不仅按简单需要来安排，且按财富来安排。因此，维塞尔对现存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提出了批评。

维塞尔认为，自然价值就是由效用决定的价值，是一种在任何制度下都永恒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今后生产力无论怎样发达，不可能所有使用价值都多到任人自由取用的程度，总还有财物是相对稀少的、不自由的。对于交换价值或价格来说，自然价值是它的一个因素，也可以说是它的基础，但不是惟一的因素，因为自然价值完全是由财物的边际效用来确定，而交换价值却非依据边际效用和购买力的结合来估计。

维塞尔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归属理论”和“成本理论”，它们把效用价值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在如何确定每种合作参与生产的财物的价值问题上，维塞尔主张采用归属法，就是以每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来确定各自的价值。他认为，每一项生产要素如要发挥效果，就必须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并把它的作用加入到其他要素的作用里去。但同它结合在一起的要素又可以变换，这使我们有可能辨别各项要素的特有效果。这个可以变换就是说每种要素可以有多种组合，用以生产不同的产品，而每种情况下也有不同的价值，这样就可能以许多方程式的形式准确地弄清楚哪些成果分别归因于哪种生产要素。

在成本领域，维塞尔想到的成本是以生产要素牵涉到的专门用途来说明的。某一生产要素可能专门化到只有一种可以想像的用途。在这种条件之下，成本要素就不可能考虑其存在。例如，维塞尔在他的《自然价值》中这样说过：“只容许有一种用途的生产要素，并不享有被我们认作成本的出现所必须的条件多样性。假若有一种矿泉只能在抽干并分装在瓶子中以后才能使用，那就显然必须把它同装满这些瓶子的不熟练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加以截然不同的看待，因为，这种不熟练劳动除了把泉水盛在瓶子中以外，还能有上百种其他的用途。”对维塞尔来说，成本就是牺牲。当一种生产要素派某一用途的时候，它所牺牲的是：假如替这种生产要素选择另一用途时可能生产的物品。假若工商企业家处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会指望选择的用途所生产得来的收入，至少不低于把这种生产要素派最富于生产的其他用途所得到的收入。因此，如果有所选择的话，那么，选择的用途必须胜过其他用途的“略次的最高出价”。这是供管理上计算的“替换”成本或“机会”成本的基础。

维塞尔的另一贡献是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下价值的评定问题。他使用了“自然价值”这一名词来指他所描述的基于边际效用的评价制度，因为他相信这是一种“自然”制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他说：“即使在经济事务按共产主义原则制定的社会或国家中，货物不会没有价值。在那里正如在别处一样，仍然有欲望；可资利用的手段仍然不能充分满足他们的欲望；人们的心灵仍然抓住他的所有物不放。一切并非供人自由取用的货物，不但被人们认为是有用的，而且是有价值的；他们的价值的排列，将按可资利用的存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而那种关系最后终于在边际效用中表示出来。”

约·古·威克塞尔

约翰·古斯塔夫·威克塞尔（1851—1926年）是瑞典学派经济理论的主要先驱者和奠基人。出生于斯德哥尔摩。1868年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数学，1876年获数学硕士学位。1880年因其发表关于饮酒原因分析的演说，被人斥为缺乏经济知识，从此便改学经济学，1885—1890年赴英、德、奥、法等国留学，深入地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及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回国后长期任教于隆德大学，1900年任副教授，1903年升教授。1917年退休，退休后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威克塞尔于1889年在斯德哥尔摩的工人集会上连续讲述了《依据新经济理论的价值、资本与地租论》，该讲稿于1893年改为《价值、资本与地租》，以德文出版。1898年又以德文出版其著名著作《利息与价格》。1901与1905年将上述两本书修订合并，并命名为《国民经济学讲义》，以瑞典文出版。该书分为两卷，第一卷研究将货币抽象后的实物经济理论；第二卷研究货币经济理论。威克塞尔在经济理论上对李嘉图、庞巴维克、瓦尔拉极为推崇。他用边际原理统一阐释价值、价格、分配及生产，并且以一般均衡理论加以组合，以此构成简明扼要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同时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威克塞尔在学术上的业绩在于建立了自己的宏观动态均衡分析和经济周期理论。他是从分析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出发而建立这一理论的，这一理论同时也称为积累过程理论。威克塞尔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常常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相背离。究其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两者的变化是不一致的，有时货币利息率变动了自然利息率却不变，或者是自然

利息率变动了货币利息率却没有随之变动。而且具体而言，威克塞尔认为，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实物资本需求的增加或者是生产技术的改善导致自然利息率的上升，然而货币利息率却保持不动，从而造成两者间的差异。他认为，两者利息率间的差异决定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下落，并带动经济活动的扩张、紧缩。也就是：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这时资本家是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增加投资，跟着带动社会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物价的上涨，最终导致经济活动进入扩张。这一扩张过程是积累性地进行的，等到对劳动力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大增加，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增加，最终使得自然利息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逐渐减少而与货币利息率相等时，这种扩张就停止了，也就是这时由于投资与储蓄相一致，使得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相反而言，货币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时，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成为负数，资本家便会减少投资，于是社会收入下降，消费减少，物价下降，最终使经济活动处于收缩状态。这一收缩过程仍然是累计性进行的，等到收缩到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下跌，生产成本下降，使得自然利息率逐渐增加，最后达到与货币利息率相等，最终使整个经济又恢复到均衡状态为止。由此可见，只有当两种利息率的差额为零，资本家增加或减少投资都无利可图时，才不会增加或减少投资，于是生产和物价稳定不变，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威克塞尔就是这样企图用两种利息率的差异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这就是他的所谓积累过程原理，即宏观动态的均衡分析。

威克塞尔支持货币对经济会起积极作用的观点，他坚决反对那些旧货币数量论者宣称的货币对经济实质不发生影响的观点。而他所谓货币的积极作用，无非就是货币媒介交换、媒介投资、媒介资本交易以及促进储蓄、促进资本形成等作用。其中他尤为注意的是货币媒介资本交易的作用，认为本来企业家进行生产所需要的是实物资本而非货币资本，但是由于在货币经济内，企业家所进行借贷采取的是货币的形态而不再是实物形态，其借贷的因此是货币资本，支付的就是货币利息，而原本应该一致的货币

利息率与借贷实物资本所支付的自然利息率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不一致的，从而导致经济常常处于不均衡状态。在这里所谓的自然利息率，是指假使一切借贷不使用货币，而是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时的资本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息率，亦即物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需求（投资）与供给（储蓄）相一致时，预期的均衡利息率实际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或新创造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由于这个边际收益率是在投资与储蓄相一致的正常均衡状态时的利息率，故又称正常利息率。该利息率对物价完全保持中立，既不会使之上涨，也不会使之下跌。它与不用货币交易而以自然形态的实物资本进行借贷时为其需求与供给所决定的利息率恰好相等。而就货币利息率来说则是指金融市场上实际的借贷利息率，故又称实际利息率。当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不一致时，就使物价发生上升或下降的累积过程，以致使经济发生波动，失去均衡。威克塞尔主张：要使经济保持均衡状态，就得采取一定的货币信用措施，使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相一致，以此来保持货币的中立，从而消除货币对经济的影响。

由于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是将这两个利息率完全分离开来的，威克塞尔的货币经济理论与积累过程原理在经济学说史上确实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威克塞尔通过积累过程原理把经济的均衡分析开始动态化，以利息率为纽带，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建立起了统一的货币经济理论，并以此来说明经济周期的波动。也正是因为他的积累过程理论是通过货币利息率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因而，他企图在政策建议方面也借助于调节利息率来克服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借助于控制货币数量来克服经济周期的波动。威克塞尔的宏观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对于现代货币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以及对于凯恩斯用储蓄——投资分析来考察就业和生产都有较大的影响。

卡尔·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著名理论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考茨基于1854年10月16日出生于布拉格，9岁时全家迁往维也纳。在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运动影响下，考茨基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1874年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同年秋考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1875年1月，在维也纳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来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0年，应卡尔·赫希伯格的聘请，当了他的出版事业的助手，迁到苏黎世。

1881年初开始与马克思通信，3月来到伦敦，见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很多的教育，从此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个天生的俗种”，从未达到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步。1881年7月重返苏黎世，第二年因赫希伯格破产，他辞去了工作，回到维也纳，筹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1883年1月《新时代》创刊，考茨基担任这一杂志的主编一直到1917年。

1889年，协助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手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的逆流。

自1896年开始，考茨基逐渐发展和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倾向，最终蜕变成一个修正主义者。“十月革命”以后，成为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凶恶敌人。191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参与了镇压德国无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

1938年，当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时，考茨基逃往捷克，后又逃到荷兰。1938年10月17日死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考茨基的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土地问题》(1899)、《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帝国主义》(1914)、《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再论我们的幻想》(1915)、《俾斯麦和帝国主义》(1915)、《帝国主义战争》(1917)、《无产阶级专政》(1918)、《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1921)、《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1921)、《唯物史观》(1927)、《处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930)等。

“超帝国主义论”是考茨基的著名学说，集中反映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考茨基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和技术的种种原因，工业的发展总是快于农业的发展。工业产品和工业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农业生产的生活资料和农业地区市场的增长速度。

考茨基完全接受了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理论，认为工业和农业之间不可能达到平衡，资本主义工业民族就必然产生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考茨基根据自己对帝国主义的上述解释，认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政策的最后可能的表现形式。而且，既然帝国主义只是一种政策，同经济没有必然联系，那就完全有可能以另一种办法来代替它，帝国主义国家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也必然要这样做。因此，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即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互相斗争，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主要内容和反动本质可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基础上形成的特殊阶段，而把它看成只是资本主义国家

所采取的与其经济基础并无内在联系的一种特殊的政策，只是资产阶级所表现的与自身利益相矛盾的一种侵略扩张的政治意图；抹杀侵略扩张和掠夺战争同帝国主义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宣称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采取与帝国主义现行政策根本对立的另一种政策，即通过和平和民主的途径发展经济的政策；回避帝国主义时代所出现的尖锐矛盾和问题，规劝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群众耐心等待在世界资产阶级广泛联合的基础上出现的持久和平和自由民主的新纪元，即所谓“超帝国主义阶段”，彻底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挽救资本主义的垂死命运。

考茨基的这种“超帝国主义论”是极其荒谬和反动的，完全歪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起着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斗志、挽救资本主义的反动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耻背叛，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考茨基还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议事日程的条件下，考茨基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可耻地为帝国主义反动统治效劳。

首先，极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考茨基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提供基本前提并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断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其他条件的成熟，不必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自然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在他看来，美、德、法、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会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民主充分加强，就会和平地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不必要了。而像俄国这样只有中等生产力的国家，是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发动了革命最后也一定要失败。总之，按照考茨基

的逻辑，无论条件是否具备，都不应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其次，千方百计地诋毁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而且是完全对立的。他说，“我们必须像反对无政府主义那样坚决反对专政。”他断言：“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托尔斯坦·凡勃伦

托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年）是经济学制度学派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1857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的小农场，生长在威斯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乡村。他的父母重视教育，鞭策孩子们出人头地和不断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尔顿学院，凡勃伦跟随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学习经济学，接着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师从哲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查尔斯·皮尔斯学习哲学，在此期间，还师从美国经济学会的创立者、杰出的经济学家里查德·伊利研修政治经济学。后转学至耶鲁大学，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门下研究哲学，并于188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但由于当时哲学家就业市场不景气，凡勃伦无法找到一个哲学方面的教职。经过7年埋头苦读，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和他的导师J·劳伦斯·劳克林一起到芝加哥大学，在那里执教14年。之后，不停地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找工作，曾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密苏里大学等院校。

凡勃伦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进化的经济研究》（1899）、《企业论》（1904）、《制作的本能与工艺的情况》（1914）、《既得利益与工艺的情况》（1919年出版，1920年重版时改名《既得利益与普通人》）、《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不在所有权和最近的工商企业——美国的事例》（1923）、《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我们正在变化中的秩序论文集》（1934）等。

凡勃伦将制度定义为“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然后开始他的“制度导向”的研究。他认为制度不是组织结构，而是大多数

人所共有的一些“固定的思维习惯”。他用“本能代替理智来解释人类的一切活动”这样一种心理学作为理论的基础来解释社会经济活动。在他看来，经济制度是人类利用天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物质需求所形成的社会习惯，而一切社会习惯又来自于人类的本能，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最终的目的，推进了人类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做的种种努力。由于本能是天赋的、不变的，因而由本能所决定的制度的本质也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态。

凡勃伦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进化的科学。他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生物进化的规律等同起来。由于生物的进化是逐渐演变的，因此，凡勃伦认为制度的进化也是逐渐演变的，而不是突变的。同时，制度的演进不但是一个永不结束的过程，而且改变的趋向和进化的将来形态，除了短期外，都是不可能预期的。他在《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一书中指出：“没有一个人今天能预测现在欧美社会的趋向。固然工人阶级有可能循着社会主义理想前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际纷争、没有朝代的新社会。但是同样地有可能，工人阶级……由于忠诚习惯和竞赛精神倾向的领导，热情地投身于朝代政治……从达尔文的观点上说，我们不可能预言无产阶级将是往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回过头来，把他们的力量埋入爱国主义的广阔的沙土里。这是一个习惯和固定倾向的问题。结果如何不是一个逻辑推论而取决于对于刺激的反应。”这表明，凡勃伦虽然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缺陷，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会取代资本主义。

凡勃伦还论述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认为，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有两个主要制度，一个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制度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是现代经济的决定性的因素。机器的应用引导出一切和工业革命相关的变革，如工厂制度、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货币、信用等。机器利用的目的是无限制的商品生产。但是，私有制下的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化的利润。因此，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存

在矛盾，资本主义的缺点就是由这一矛盾产生的。凡勃伦认为，在手工业时期，由于市场的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利润的增加可以一致，但在机器生产时期，市场不能随生产的扩大而按比例地扩大，于是，生产和利润的矛盾产生且不断加剧。这就是19世纪初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凡勃伦把资本主义制度叫做价格制度。价格制度的基础是机器利用，而其控制力量则是企业经营。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企业经营统治着机器利用，从企业经营的眼光来看，机器利用的生产能力过于庞大，为了适应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有必要把工业生产控制在其生产能力之下，以维持一个高的价格水平。19世纪末期出现的垄断组织就是以控制和减少生产来取得高额利润的。凡勃伦称这些垄断组织为“既得利益者”和“不在所有者”，并对其进行谴责。同时，凡勃伦认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都是从进化中产生的，企业经营对机器利用的统治不是绝对的，他们的相对地位在进化过程中逐渐改变。他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技术人员的地位作用不断加强，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取得管理社会经济的权力，那么，追求利润的企业主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掌握经济控制权。

约翰·康蒙斯

约翰·罗格斯·康蒙斯（1862—1945年）是制度学派早期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蒙斯1862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荷兰斯堡，早年就读于奥伯林学院，并获文学学士学位（1888）。1888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受教于伊里，开始接触法律和经济学的关系问题。1889年为美国产业委员会研究移民问题，跑遍了美国的全部工会领导机构，这为他研究资本家和劳工组织对产量的限制创造了条件。1890—1932年，他先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印第安纳、奥伯林、韦斯利、威斯康星等大学。从1905年起，主要从事立法实践及相关的调查研究。此外，康蒙斯还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金融协会会长。

康蒙斯的主要著作有：《财富的分配》（1893）、《美国工业社会的历史纪实》（10卷，1910—1911）、《劳工立法原理》（1916）、《美国劳工史》（4卷，1918—1943）、《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制度经济学》（1934）、《集体行动经济学》（1940）。

康蒙斯所说的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而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他认为，法律制度不仅先于经济制度而存在，并且对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他看来，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是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制定和确立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由于制定了新的法律制度。

康蒙斯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他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所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由于参加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会有双方的利益冲突，只有依靠法律制度才能解决。康蒙斯

还进而在理论上把经济范畴归结为这些范畴的法律关系。他不是把所有制形式当作经济关系来分析，而是把“所有权”范畴当作法律形式加以考察，并宣称“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因此，他特别重视国家和法律的作用，提出以国家和法律机构作为一切交易契约的公证的仲裁人，依靠法律来管理经济的主张。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和最主要代表，康蒙斯提出了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这就是康蒙斯的制度经济学。康蒙斯发展了资本主义进化的理论，把它们作为削弱资本主义主要弊端的缓和力量。他承认和强调发生在制度内的个人经济行为，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在控制、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方面的集体行动。按照康蒙斯的观点，从方法上讲，传统的个人主义把研究重点集中在个人买卖方面，是不可能突破支配经济体系结构特征的各种力量、工作规则和体制的，而个人则在此体系内部进行流动。经济体系发展和运动的关键是政府，政府是采取集体行动和进行变革的首要工具。康蒙斯精心研究的是制度、工会和政府，尤其是司法制度，其所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有着严密的体系，主要为：

稀缺性——理论的出发点

康蒙斯把稀缺性作为他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在他看来，稀缺性不仅是冲突的根源，而且也是合作、同情、公道和私有财产的根据——假如一切东西都是无限地丰裕，那就不会有自私、不会有不公道，也不会有财产权和伦理学。他甚至认为，如果我们熟悉现代的工会伦理以及工业、商业和银行业务伦理，我们就会看出完全是由于休谟所说的机会稀少和其结果的利益冲突，才从冲突中产生了那一切经济上的美德，例如诚实不欺、公平交易、公平竞争、合理地使用经济能力、机会均等、自己生活同时让人生活、商誉和合理价值，这些都是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二位，首先应该和别人分享那有限的机会，才可能平平安安地从事交易，保持整个机构的不断运转。康蒙斯强调稀缺性所导致的人为秩序即集体行动。

冲突、依存和秩序——分析的延续

既然世界上的东西是有限的，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是稀缺的，因此，某一个人多使用一些资源，别人所使用的资源就减少一些，反之亦然。这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康蒙斯认为，以前的经济学均把消灭冲突作为目标，只研究未来的理想化的协调，而不是对现有冲突以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的秩序进行科学研究。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则是研究如何从冲突中产生秩序。得出的结论是应该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秩序，而不是采取别的办法来消除冲突。在他看来，在秩序中可以继续存在冲突，而且不仅存在相互冲突，还存在相互依存。他把冲突和依存归结为基本的社会关系，这只有在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秩序中才能共存。

交易——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

在康蒙斯看来，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必须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种成分。他通过多年研究，发现只有在一种“交易”的公式里，它们三者才能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将“交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所谓“交易”，康蒙斯将其定义为一种合法控制权的转移单位。因此，所有权成了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康蒙斯在分析交易时，将其分为三类：（1）买卖的交易；（2）管理的交易；（3）限额的交易。他认为，这些职能相互依存，并且共同构成我们比做“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个组织。买卖的交易参与者是个人；而在管理的交易里，上级是一个人或是一种特权组织，发号施令，下级必须服从；可是，在限额的交易里，上级是一个集体的上级或者是它的正式代表人。买卖的交易的一般原则是稀缺性，而管理的交易的一般原则却是效率。

无形财产——合理价值

无形财产，指的是把持住别人所需要而不具有的东西来规定价格的权利。它对于制度经济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康蒙斯认为，马克思、蒲鲁东、凯雷、巴斯夏等模糊地认识到了所有权同

物质不是同样的东西，制度经济学才有了一些萌芽，而凡勃伦正是采用了无形财产的概念而被称为制度经济学家的，无形财产的概念，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和习惯法中的合理价值概念，它只有在交易中才会出现。

威尔纳·桑巴特

威尔纳·桑巴特（1863—1941年）是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曾在柏林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学意大利，18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88—1890年间任布莱门商会会长。1906年被聘为柏林商学院教授，1917年接替瓦格纳任柏林大学教授直至1931年退休。1904年与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联合主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立法和统计》等杂志。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第10版改题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1902）、《三种经济学》（1930）等。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持同情态度，主张实行“社会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主张经济现象应该与历史的社会的整体联系起来研究，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社会学”。同时他提出“三种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极力反对“规范的经济学”的方法和“因果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主张“理解的经济学”的方法，认为“理解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制度，以及支配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经济意识和经济活动的动机。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强调精神（经济意识）形成经济生活、创造经济组织，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归为“资本主义精神”。他在其最后一本著作《一个新的社会哲学》（1934）中，试图用纳粹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成为希特勒法西斯的同情者。

桑巴特一面继承历史学派的遗产，一面企图克服历史学派缺乏理论体系的缺点，试图将理论与历史加以统一。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他使用了“经济体制”和“经济时代”这两个概念，作为其理论体系的统一基础。

桑巴特所谓的“经济体制”是指由一种经济意识和技术、劳

动组织所构成的经济体系，即所谓纯正的“理想型”。他用它来作为观察经济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尺度，并测定各个具体的历史现实与这种纯正的“理想型”之间的差距。

桑巴特的“经济时代”的概念是和他的“经济体制”概念相对的。他把纯正的“理想型”的经济体制称为“全盛时期”（高度发达时期），在全盛时期以前，则为“初期”或“早期”，以后则为“后期”或“晚期”。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资本主义，从15—18世纪中叶；高度发达时期的资本主义，从1760—1914年；晚期从一战结束开始。

桑巴特主张经济现象应该与历史的社会的整体联系起来研究，经济学应当是“经济社会学”。他提出“三种经济学”的方法，反对规范的经济学的方法和“因果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主张所谓的“理解经济学”的方法。他根本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把精神（经济意识）形成经济生活、创造经济组织，当做一种根本思想，并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动力，归置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希特勒上台后，桑巴特歌颂法西斯独裁政体，拥护国家社会主义，鼓吹优等“种族”统治“劣等”种族，宣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最终堕落成为一个自动的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

威斯利·密契尔

威斯利·克莱尔·密契尔（1874—1948年）是制度经济学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经验统计学派的创始人。密契尔出生于美国拉什维尔，早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师从凡勃伦，并获得文学学士（1896）和哲学博士（1899）学位。他起初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1913年开始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直到1944年。密契尔还曾任位于纽约的全国经济研究所主任（1920—1940）等职。他一生从事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及其统计资料的收集，到去世时还在写作《经济周期内发生的事情》的未完成的手稿。他对经济周期的深入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当时这一领域的权威，而且还影响到今天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研究。

密契尔的主要著作有：《美钞的历史》（1903）、《以美钞作本位制下的黄金价格和工资》（1908）、《经济周期》（1913）、《指数的编制和使用》（1915）、《经济周期：问题及解决》（1927）、《零花钱的回流办法》（1937）、《经济周期的计量》（与A·F·伯恩斯合著，1946）、《经济周期内发生的事情》（1947）。

密契尔在经济理论上最主要的贡献是经济周期的研究及其统计论证方面。他在研究经济周期时，依据统计材料，指出经济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产生着下一阶段，即繁荣导致衰退，衰退又导致繁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这样波浪式前进的。他反对用均衡原理来描述经济过程，认为均衡概念是虚构的东西。

密契尔还进一步批判抽象演绎方法。他指出，不应先有理论概念，然后再用它来整理事实材料，而应当先对事实进行经验统计的分析，然后归纳出原理。密契尔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认为制度因素的作用对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过程的重要性，都是以经验统计的分析作为依据的。他在分析经济周期时，收集和整

理了各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材料，使之成为实物指标和价格指数动态数列形式，叫做“动态数列分析”。密契尔的研究，推进了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注意运用统计学和数量分析方法，并成为美国经济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密契尔一生都强调假设的发展同检验假说与事实是否一致，这两者之间需有密切的相互作用，他是通过这种强调对经济理论做出贡献的。这种强调在他的经济周期著作和在全国经济研究所的许多领域的研究中都表现得很明显。1945年他在任主任期间的最后一次报告中这样说：“我们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有助于奠定以下经济学科基础的人，即这种经济学的观点是有据可证的，而精明的读者又能对此证据做出独立的判断……纯理论体系能迅速而准确地设计出来，因为它不要求经济学家去收集分析大量的资料、检验假设与事实是否符合、抛弃不相符的假设、设计新的假设并进行检验，直至最后建立起有事实根据的理论。”密契尔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与他煞费苦心观察和记录的周期经验事实相一致的一般经济周期理论。其经济周期理论可概括如下：

1. 在密契尔看来，近代经济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货币经济性质。在近代经济中，不仅以货币作为交换手段，而且一切经济活动均以争取和花费货币形式而进行。一个人的财富，在经济意义上看，不取决于他提供或节约有用财货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他支配一个适当的货币收入和实行金钱节约的能力。一般地说，有很多争取金钱的方式并不对国民福利做出任何贡献，而能增进国民福利的一些因素（如自然资源、机器设备和工艺技能等）又未必能起作用，因为在货币经济条件下，这些因素只能在人们于其生产中期望获得一定的利润时才加以利用。

2. 在《经济周期》中，密契尔对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做了极客观的描述，同时又以大量统计史料为依据，论证了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必然连续过程。他放弃了一般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均衡分析方式，而是从整个经济活动的经验探索中去寻找经济波动的内在不稳定性。他把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首先归于谋取货币的过程，在他的著作中，经济周期的自行调节成为近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

历史运动的同义语。货币经济中的生产由现实的和预期的利润决定，而利润又与成本、价格及其他因素相关，对所有这些因素之间关系的调整，经常会出现失误，于是形成周期的波动。

3. 密契尔选出了一些特殊因素，如货币因素、气候的周期变动、储蓄过多、消费不足、投资过多或不足等，作为解释经济周期的先验依据，进行资料收集和统计检验。也正是在这种经验分析的信念支配下，他才成立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他的这种经验分析方法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仍有很大影响。现在，主流派的经济学家在做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时，仍然要以这种方法为基础。库兹涅茨就是用这种方法研究现代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阿瑟·庇古

阿瑟·塞西尔·庇古（1877—1959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于1877年出生于英国怀特岛。1897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历史学和伦理学（当时经济学包含在伦理学中）。后来受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学习经济学。毕业后任剑桥大学讲师，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并任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1908年马歇尔退休，庇古继任其在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位，因此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他占据该席位长达35年之久，直到1943年退休。退休后，他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过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庇古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一是创立了福利经济学完整体系；二是重新解释了古典边际生产力理论。主要代表作有《财富与福利》（最初于1912年出版，后来于1920年以《福利经济学》再版）、《失业理论》（1933）、《就业与均衡》（1941）等。

庇古作为马歇尔的学生，是剑桥学派的最正统最权威的解释者，在庇古一生成就中，最突出的就是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次就是将马歇尔的货币数量理论用数学公式表示，提出了著名的剑桥公式。

庇古认为：“经济福利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影响于：

- （1）国民收入的大小；
- （2）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况。”

这是庇古福利经济学主要涉及的两个命题。首先，庇古把“福利”区分为一般福利和经济福利两种。前者指人们对一般的

欲望、感情和知识等方面的满足，这已是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后者专指同人们经济生活有关的效用的满足，这是可以用货币直接或间接衡量的福利，也就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所论述的“福利”。庇古认为这种福利“对全社会总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用马歇尔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不变的原则来衡量个人的经济福利，然后加起来形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为衡量经济福利，庇古提出了边际效用基数论，他认为，福利在于满足，满足由效用表示，而且，满足或效用可以用人们为获得它们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来计量。他又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不变，他所持有的某种商品越多，那么，他对于增加的单位商品量所得的效用会越少，因而他对所增加的单位商品量愿意支付的货币量（单位价格）也就会越少。一个人为了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效用，需要合理地分配自己的货币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使多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商品的价格成比例。

既然个人经济福利是可以计量的，社会福利当然也是可以计量的。庇古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量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福利的量，所以一国的国民收入愈大，则经济福利也愈大。而要增加国民收入，就要增加社会总产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间的配置能够达到最佳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庇古提出了“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边际私人纯产值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私人收入所增加的值，它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边际社会纯产值则是指社会因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纯产值，它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二者不一定完全一致，如边际私人纯产值间接地给别人带来利益，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就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个别厂商的生产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庇古称之为“边际社会成本”。他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各方面投入的生产资源所形成的边际社会纯产值可以趋于相等，同时它们的产品价格也等于其边际成本，此时的生产资源配置即达到最优化。

庇古还把边际效用学说引入分配领域，提出了收入均等化学说。这一学说基本命题是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

利就愈大。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认为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贫穷阶层的货币收入很少，所以他们的货币边际效用很大。与此相反，富裕阶层的货币收入较多，所以他们的货币边际效用很小。为保证收入的均等化，庇古提出了实行累进税的政策主张，把富人的一部分税款用于举办社会福利设施。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实际上是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发展，他完全是在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的基础上，讨论福利概念以及与福利有关的各种理论。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庇古一味沿用马歇尔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福利经济学，决定了这一学说存在着致命的缺点。首先，他所谓经济福利是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认定效用可以衡量，这是他的理论的根本错误。他以为采用马歇尔的办法，即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就可避开效用衡量的难题。但是，马歇尔所分析的对象常是占个人总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货币支付量，尚可勉强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为常数。而庇古的研究的对象是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就不能再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为常数，特别是他注重分析货币在富人和穷人间转移，并以他们对货币的边际效用的变动为理论根据，如再假定货币边际效用为常数，结果就会自相矛盾。其次，马歇尔体系虽从效用出发，但事实上大都从分析供求价格出发，等于是直接考虑货币价格问题。而庇古的研究主题是经济福利，必须从真实条件着手，于是如何将真实的经济福利转算为货币福利，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效用及其衡量问题。再次，他的理论以完全的自由竞争为前提，但又提出由国家采取适当调节生产的措施，将会增加社会福利，从而否定了自己的前提。总之，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在实践上仍属于一个“理想”状态，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没有改变人们对经济福利问题的思考方式。但是，他第一次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个新的分支的产生，因此，庇古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马寅初

马寅初，1882年诞生在中国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主的家里，幼年随全家迁居绍兴附近的嵊县。1898年，马寅初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后又到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1906年他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均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新人口论》等等。

《新人口论》是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学界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翻开这本薄薄的但又份量十足的《新人口论》，便会惊讶于书中的思想与价值竟然与我们的现实贴得这么近。

到下一个世纪中叶为止，人口问题将一直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谈到中国国情时，第一句就是：人口众多，由于带来的人多地少之矛盾、能源短缺和水资源不足、人口压力产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产生了妨碍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住宅紧张、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使我们认识到，解决人口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问题。

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

这个中心论点解决了这样一个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马寅初用具体数字说明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他说，1953年，国家曾经对全国人口进行一次深入的普查，并且得出中国人口的增加率平均每年220‰。建国以来，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如就业的人多了，组织家庭比过去容易了；妇女在产前产后都有休假，加上保健事业的发展，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内战消灭了，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已经没有了；还有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尼姑、和尚也结了婚。这些条件都是人口增加得快的原因。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就是26亿，因此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

遗憾的是，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真正实施起来。

当我们国家确定“计划生育”这条国策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在抓我们的辫子，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这种论调，首先没有认真分析我们的政策，其次带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按照马寅初的观点，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尊重人权的一个重要措施。

“人权首先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任人口肆意增长，让更多的人饿死、冻死，那才叫侵犯人权呢！

另外，马寅初还提出了“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的观点。

他认为人工流产是应该坚决反对的，要说侵犯人权，人工流产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我们要杜绝人工流产，马寅初说，既然已经怀孕，“人”形成了，“他”就应该有生的权利，把他杀掉，就是犯罪。父母杀子女，这成什么话！同时，人工流产对母亲的健康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还认为，如果赞成人工堕胎，就会把避孕意识冲淡了。

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当时提出了他的主张，这些主张在那时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是科学的。

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要破除宗嗣继承观念，破除“早生贵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步，“待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第三步，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

《新人口论》中还提到了“提高人口质量”的问题，原理大家都明白了，但实际上又如何呢？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年了，人口增长得到了缓解，但不能不看到，真正得到缓解的是城市，因为城市居民文化素质高，观念上、行政上都容易转变和实施，而往往在贫穷的农村地区，“愈是贫穷——人口生产愈多——无法接受教育——愈是贫穷”的恶性循环还在延续。

马寅初强调一定要把质与量配得适当，这一点上对于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国策不能不说有强调的必要。

《新人口论》中的所有这些观点曾经被说成“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理由是他把人看成了消费者，没有首先想到人是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而实际上，马寅初可比马尔萨斯高明多了，他还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了批判。他指出其，“马尔萨斯写人口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政府”；另一个根本不同之所在，马尔萨斯鼓吹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手段来消灭现有人口，而马寅初主张从人性出发，科学地引导，使人口渐渐地减少。

马寅初的真知灼见是划时代的，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这点而言，又有几人能与马寅初相比？

我们一谈到中国人口问题，一定会马上想到马寅初的名字，这位中国著名的人口学专家、经济学家，以其提出的“新人口论”而闻名于世，尤其当我们感受到人口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将作如下感叹：如果40年前就采用了马寅初的人口论，那该有多么好啊！

当我们从人口困惑中开始清醒的时候，才从历史的尘埃中捡

起这本已是伤痕斑斑的《新人口论》，发现它闪耀着理性之光，以至于被认为是“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本好书”。

而如今的事实也已经印证了马寅初在被批判时所说的那一句名言：

“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情，没有什么，可是，我想所写的《新人口论》，是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过几十年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约翰·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少年时代就读于伊顿公学。1902年进入剑桥大学专攻数学，1905年获数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留校期间向马歇尔和庇古学习经济学。1906年底参加文官考试，被分配到财政部印度事务处工作。两年后经马歇尔的推荐，返回剑桥大学并讲授金融学。1909年以一篇概率论的论文取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士资格。1913年出版第一部专著《印度的通货与财政》，考察金汇兑本位制的职能，主张把印度的货币紧密地同英国的货币联系在一起。由于此书的影响，使他于1913—1914年期间被任命为皇家委员会调查印度通货和财政的委员，并于1915—1919年调任财政部担任顾问。1919年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会后，他写成了《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一书，强烈反对向战败国的德国索取过多的赔款，认为让德国支付巨额赔款不利于欧洲经济的恢复。此书使他一举成名，成为一位国际社会上颇有影响的政治经济问题评论家。此后，他一方面执教和著书立说，出版了《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等一系列著作；另一方面，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1941年以英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积极参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凯恩斯未曾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正规训练，直到1936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他才最终创造出一个新的理论结构，第一次以系统的形式阐述自己的经济学说。他提出了总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均衡、不确定性、流动性偏好陷阱等新的理论概念，着重于对经济总量的分析，用以说明经济危机、长期萧条和失业的现

象，并且，进而一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传统，提出了一套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主张。这些均被视为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划时代的贡献，并被后人誉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所处的历史时期正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而同时 1929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和破坏性都是空前的，因此，凯恩斯所面临的是就业问题，增加就业的直接而有效的方法是增加生产，但当时经济不景气，企业不愿增加生产，也就不可能增加就业量。于是，凯恩斯开辟了另一条道路，扩大总需求，以刺激总供给，从而扩大就业。

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原则。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交点上的总需求数值。这一点之所以“有效”，因为它代表着符合企业主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就业水平。具体地，以 N 代表雇佣的工人数量（就业量），以 Z 表示产出量的供给价格，则企业的总供给函数为 $Z = \Phi(N)$ ，意味着雇佣 N 名工人所必须达到的最低限度的产品销售额与就业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类似地，以 D 表示企业主的销售额，则总需求函数为 $D = f(N)$ ，意指预期人们为购买相应数量的产品愿原意付出的总支出与就业量的函数关系。简言之，对企业主来说， $Z = \Phi(N)$ 是预期至少能收回成本并获得正常利润的最低总收益， $D = f(N)$ 是预期市场上对相应产量的总需求，两者同为雇佣量的函数，因此，两者一致时，就决定了实际就业量。只要 $D > Z$ ，企业主就会设法扩大生产，就业量随之增加，直到 $D = Z$ 。这种使经济达到均衡的社会总需求，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因此，可以说，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那么有效需求决定于什么呢？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效需求一般总不足，或者说，在通常情况下的有效需求总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原因可以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来分析。其一是心理上的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但出于“预防不测事件”、“养老”、“子女教育”等主客观原因的考虑，人们往往会把增量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储蓄，结果消费的增长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

一，从而导致经济体系中消费需求的不足。除非投资需求不断扩大，以弥补边际消费递减所留下的缺口，否则就不可能增加就业量。其二是投资诱导问题。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大小取决于投资引诱，投资引诱等于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的差额。为什么呢？凯恩斯是这样解释的：“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至少等于利息率时，资本家才肯进行投资，否则，如果资本边际效率小于利息率，资本家便不会进行投资，而宁可把资本存放在银行里，以获取较高的利息收入。”所谓资本边际效率，即新增加一个单位资本所预期的利润率。凯恩斯认为在技术装备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社会投资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是会趋于递减的。资本边际效率为什么会递减呢？凯恩斯认为，当资本家对工厂设备进行新的投资时，他不仅要考虑现有设备的数量，而且还要对将来各个时期的竞争情况、有效需求和政治情况等影响收益的因素，作长期的预测；由于资本家对未来的预测缺乏信心，所以他们所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常常偏低而不稳定。因此，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这一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社会对私人投资的诱惑力愈来愈小，从而使资本家阶级不愿意对社会进行投资，结果出现了社会投资不足的现象。另外，再从利息率方面来看，凯恩斯认为利息率是由货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货币的供求取决于货币的数量，货币的需求取决于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的心理状态。所谓流动偏好，就是指人们对现金的偏好。人们手中如果拥有一定数量的现金，就可以满足支付各种开支的需要，应付任何意外支出和进行市场投机活动。所以利息率取决于人们的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他认为，如果货币的需求不变，货币的供给增加，利息率就会下降。反之，货币的需求增加，货币的供给不变，利息率就会上升。总之，凯恩斯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引起投资不足，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的存在。

基于上述观点，凯恩斯认为，单凭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是不能医治资本主义的失业症的，惟一的方法就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他说：“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

能不能扩大，这从 19 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惟一切实方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因此，凯恩斯指出，必须放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以确保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凯恩斯提出的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按凯恩斯的说法，财政政策是通过改变国家的消费和投资的方法来改变国民收入的水平，有两条途径，即改变预算支出和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的增加或减少顺次意味着国家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或减少。另一方面，预算收入的增加或减少顺次意味着国家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和增加。实施货币政策的立足点在于国家可控制货币数量，而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的条件下，货币数量的大小可以影响利息率的高低，而在一定的资本边际效率的情况下，利息率的高低又可以决定投资量的多寡。当消费水平不变时，投资量的多寡又决定国民收入的水平。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就能够被稳定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不会出现长期的失业，也不会出现长期的通货膨胀。

作为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凯恩斯学说，其根本点在于为资产阶级而服务，因此，他的学说仍有其局限性，如他用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均衡说明有效需求，而这两者都是资本家心理预期的东西，前者包括资本家预期的利润，后者是资本家预期的购买价格，因此，二者的均衡不过是资本家这两种预期之间的均衡。这就在原来的庸俗力量上更加进了唯心主义的因素。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危机和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说危机和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这完全是一种现象的描述。正如马克思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此之外，在他的学说中还存在着不少阐述不清晰甚至矛盾的观点。但凯恩斯及其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其理论有许多合理的部分，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凯恩斯的理论体系系统地创立了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根本因素为基础

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简单，能够控制，可以形成经验公式，并与经济政策问题直接相结合，从而促使关于政府作用的正统观念发生了一场革命。在实践中，凯恩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宏观经济政策。

约瑟夫·熊彼特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特利希镇一个织布厂主家。他早年在维也纳大学庞巴维克的门下学习；之后赴伦敦进修经济学，在马歇尔的门下求教。1909年起在切克诺维茨大学和克拉兹大学执教；于1919年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1921年担任比得曼银行董事长；1925—1932年担任波恩大学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0年逝世，他一直保留奥国籍。他是经济计量学协会的创始人，并担任该协会1940—1941年届会长；还曾任1948年届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

熊彼特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理论学的本质与内容》（1908）、《经济发展理论》（1912）、《教条与方法论的时代》（1914）、《经济周期》（1939）、《帝国主义和社会阶段》（1941）、《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1942）、《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1951）、《经济分析史》（1954）等。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内容包括：他的经济成长、经济周期、创新观点等早期思想雏形。在成长理论方面，他有两个特殊观点：第一，认为只有企业家才能把土地和劳动这两个内在因素的使用进行新的组合，才是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他只将劳动力和土地视为内在生产因素，而将人EI、欲望、生产组织的变化等列为外在因素，显然是不确切的；第二，他强调银行信用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特别强调银行对未来劳务和商品所提供的信用（他称为“非正常信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中的过分强调银行信用和将银行信用分为正常和非正常，是不全面和不合逻辑的。但其强调银行信用的观点却被数十年后的

西方货币成长论者推崇为珍贵的先行思想资料。此外，他的《经济周期》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动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历史统计资料。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是熊彼特的著作中最为畅销的一部，这本书从刊行到他逝世的8年中，共发行了13版。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现象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资本主义的竞争主要是由创造性的破坏所决定，而不是由价格起支配作用的竞争过程所决定，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使资本主义得以不断从内部更新经济结构。因此，资本主义决不是静止的，创新、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它们，资本主义就不复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创新日益成为日常事务，技术进步成为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事业，企业家的社会经济职能逐渐消失。经济发展日益成为非人格性的和机械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成功使资本主义本身成为累赘，最终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使得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但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由中央机构直接控制生产和分配的一种组织形式，决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与20多年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观点是相同的，只是由他这样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加以宣扬对一些尚无经济学素养的读者更具迷惑性而已。

再来探讨熊彼特的“创新论”。熊彼特是以“创新论”闻名于经济学界的。他用“创新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他将该理论坚持了数十年并贯穿到他的各种理论中。在理论上，他先将社会经济活动区分为“经济循环”和“经济发展”两个类型。在前一种状态下，任何经济活动都以相同形式周而复始地运行，使各经济主体得到其欲望的最大满足，不存在利润或利息。在后一种状态下，则出现了企业家这一角色，他们为获得利润而不断地致力于生产方法的变动甚至革新，从而不断地改变和打破现存的均衡状态。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

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强调，“企业家”的职能就是不断地引进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来实现“创新”，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惟一动力。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组合。他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并非指一般的技术进步和创造发明，而是有其特殊含义，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商品市场；控制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以及实现企业的新组织。他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因素；经济发展也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来自内部自身的创造性。只有在实现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资本。企业家的涌现是少数企业家的出现带动了其他企业家的出现的体现，经济下降则是模仿生产的利润份额减少的结果。总之，“创新”的特点就在于他把所谓的创新视为企业家的惟一职能。企业家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内在创造力，没有创新资本主义就不可能产生，更谈不上发展。创新导致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而历史上的创新千差万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大小不同，因而其周期有长有短。他综合了前人的论点，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周期的主张：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捷夫周期”，每一周期历时50—60年；第二种是通常所说的平均9—1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又称“朱格拉周期”；第三种是平均40个月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他宣称这几种周期同时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熊彼特还把经济衰退看做经济调整的健康阶段，衰退为未来创新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熊彼特的不朽之作《经济分析史》充分体现了他的博学多识和见识独特的特点，该部著作是他尚未最后完稿的遗作，是由他的夫人代为整理出版的。该著作至今仍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普遍称颂的巨著。熊彼特对许多经济学家的贡献都做了独到的评论。例如，他认为瓦尔拉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一些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熊彼特则贬低了他们的贡献，因而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阿尔文·汉森

阿尔文·哈维·汉森（1887—1975年）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家，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维伯格。1910年获南达科他州兰克顿大学学士学位，1914年入威斯康星大学，1918年获博士学位，1919年在布朗大学任助理教授，接着受聘于明尼苏达大学，执教达20余年，1937年起受聘于哈佛大学。1937年任美国统计协会的副会长；1938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汉森曾担任过美国政府机构中的许多职务，如1933—1934年任美国总统国际经济关系国家政策调查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1937—1938年任美国总统社会保障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941—1943年任美国加拿大经济联合会主席；1940—1945年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特别经济顾问等等。他1957年从哈佛大学退休，之后他作为访问教授在博姆贝大学和许多美国大学任教，直到1975年去世为止。

汉森的主要著作包括：《繁荣与萧条的周期》（1921）、《经济周期理论》（1927）、《充分复兴还是停滞》（1938）、《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1941）、《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1945）、《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1947）、《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49）、《经济周期与国民收入》（1951）、《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美国的经济》（1957）、《六十年代的经济问题》（1960）等。

汉森最初是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后不久，1937年汉森转而追随凯恩斯成为凯恩斯的信徒，竭力宣扬凯恩斯主义，为在美国宣传、普及、解释与发展凯恩斯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凯恩斯学说指南》一书是这

方面的代表作。他还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培养出了一批像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汉森在经济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和运用。其主要经济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他进一步发展了混合经济理论。汉森认为，在 19 世纪末期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已不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既有私人经济又有公共经济的双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在生产上是指国营企业，在收入和消费上是指公共卫生、保健、低廉房租的住宅、社会安全和福利事业。因此他说要在双重意义上来理解混合经济，即生产上的公私混合经济和收入与消费上的公私混合经济。但是他认为，企业国有化并不是混合经济发展的趋势，主要趋势是从个人主义的经济向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混合经济发展。汉森不赞成企业国有化，而主张国家调节经济，来弥补私营经济的缺陷，克服失业、经济停滞和分配不太平均等弊病。汉森的混合经济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他把这种经济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2) 他提出了长期停滞论。汉森认为，产业革命到 20 世纪初的 100 多年中，由于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新领土开拓等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了大量投资，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迅速成长。但此后就开始了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降低，新领土开拓停止，公司储蓄达到很高的程度，资本大量堆积，发明创造偏向于节省资本等。所有这些，使投资机会日益枯竭，从而使资本主义陷入长期停滞的局面。他主张，摆脱这种长期停滞的方法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因为投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这一时期当投资诱因减弱而造成长期停滞的局势时，只有依靠政府的大力干预，特别是政府扩大财政开支才能刺激经济的发展。

(3) 用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周期。这一观点是由汉森和萨缪尔森共同提出的，又称“汉森—萨缪尔森模型”。根据这一模型，乘数原理解释了投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

影响，而加速原理解释了收入变动对投资变动的影响。正是这种投资与收入的相互作用引起了经济中周期性的波动。汉森认为，凯恩斯虽然强调了乘数理论却忽略了加速原理。他认为引起投资变动的因素有两类：一是外生因素，即人口、技术进步、新产品的发明以及政府活动等，这些因素所引起的投资叫做自发投资。二是内生因素，即收入和消费的变化，这种变化所引起的投资叫做引致投资。加速原理就是说明引致投资的理论。汉森认为，光用乘数原理不能解释经济的波动，而必须考虑到加速原理。

(4) 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汉森认为，政府在确定预算时，不能把平衡财政收支作为准则，而要按照私人支出（消费与投资）的数量来安排政府的预算。要使私人支出与政府支出的总额保持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来保证经济的稳定。据此汉森提出了所谓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即在萧条时期，政府要扩大预算开支，降低税率，提高社会总需求，造成赤字预算；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要收缩预算开支，提高税率，缩小社会总需求，造成盈余预算。按照这种政策，预算不必年年平衡，可以在萧条时期造成赤字预算，在繁荣时期造成盈余预算，做到整个经济周期内补偿盈亏，所以该理论又可以叫做“长期预算平衡论”、或“周期预算平衡论”。这种主张成为政府增加支出实行赤字财政的依据，这种理论与政策主张对经济理论和美国政策实践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汉森也是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先驱者。

(5) 汉森还提出了温和通货膨胀理论。汉森在对待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代关系问题上，主张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在他看来，温和的通货膨胀对生产和就业有利，物价上涨比失业要好得多。他认为，物价温和上涨的年代，通常也是发展迅速的年代，因此，政府不应该在物价稳定问题上有什么严格的法则，而应该把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列为主要目标。他还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分配上的弊害极力进行辩解。他认为经济学家一般容易夸大温和的物价上涨对家庭储蓄的影响，在他看来，吞噬家庭储蓄最厉害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收缩和失业。汉森的这些论点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很大，美国政府就是按照这种主张制定他们的经济政策的。

综上所述，可见汉森在理论上大力宣扬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并为美国凯恩斯学派奠定了基础。他的政策主张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起了重大作用。事实上，汉森和他的弟子们根据他们的主张而提出的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的政策主张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确起过一些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 20 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汉森和凯恩斯学派对此束手无策，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也因此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拉格纳·弗里希

拉格纳·安东·基特·弗里希（1895—1973）是挪威当代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的先驱者，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希 1895 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曾在金银首饰店当学徒，同时就读于奥斯陆大学经济系，1919 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 世纪 20 年代前半期先后留学法、德、英、美、意等国，研究经济学和数学。1925 年起执教于奥斯陆大学，并于 1926 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曾于 1930—1931 年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自此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把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研究的一位先驱者，并把这一分支命名为“经济计量学”。1930 年他在美国参与发起和创建了经济计量学协会，并担任该会刊物《经济计量学》杂志的主编达 22 年之久。在享有盛名之后，弗里希于 1931 年回奥斯陆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担任该校新成立的经济研究所所长直至 1965 年退休。退休后仍继续从事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和写作，二战后他曾任联合国的经济顾问、经济与就业委员会主席等职，并在印度和埃及担任顾问工作多年。

弗里希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测量边际效用的新方法》（1932）、《运用完全回归系统的统计合流分析》（1965）、《生产理论》（1965）、《经济计划研究论文集》（1976）。重要论文包括：《论纯粹经济学问题》（1926）、《经济理论中的静态学与动态学》（1929）、《动态经济学中的扩散问题和冲击问题》（1933）等。

弗里希是西方经济学中将数学和统计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先驱者，是经济计量学的奠基人。他首先提出了经济计量学的定义，并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波

动，首创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数学模型，最早把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区分为扩散作用和冲击作用两大类，将两者结合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从而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周期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在把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活动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

弗里希早在 1923 年就开始研究效用的测量问题，1926 年写成论文《论纯粹经济学问题》，提出了测定边际效用的“等量法”，并首次使用“经济计量学”一词。他认为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地方，要使经济学具有明确的量的关系，就要把数学和统计方法引进经济学，从而经济计量学就是“融合数学、统计学及经济理论，结合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理论和实务”。他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创刊号社论中说道：“经验表明，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方面对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每一方面都是一种必要的但本身并非充分的条件，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才是强有力的研究方法，正是这种结合构成了经济计量学。”

弗里希在 1936 年发表的《论均衡和不均衡的概念》一文中阐述了动态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被视为动态经济理论的开拓者。弗里希在《动态经济学中的扩散问题和冲击问题》等论文中率先提出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数理模型，将造成经济波动的因素区分为扩散作用和冲击作用。前者指经济体系内部的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经济变动，即所谓加速原理。后者指外在因素对经济体系的冲击引起的经济变动，即所谓或然因素的冲击作用。但该周期模型显示了一个衰减趋势，与实际观察到的周期不衰减并不相符，他认为这个模型对“扩散”问题提供了一个满意的解释，但没能解释“冲击”问题。他在创立这个模型时所借助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被西方中产阶级经济学界公认为是现代经济周期分析上的最佳原理。同时，弗里希在统计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上，具体算出需求及供给曲线，进一步把回归方程法运用于经济计量学中，创造了“统计合流分析”方法，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关联同时起作用所带来的统计问题，开联立方程式模型

之先河，为现代经济计量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弗里希除了对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做出多方面的贡献外，还把经济计量方法应用到经济分析中，在经济计划及政策理论方面独树一帜。他在这方面的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首先，通过计划过程把生活最重要目标的实现过程公式化，使得早期的计划问题得到结构明晰的阐述。其次，他并不主张取消市场机制，而是提倡对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测量并作为经济政策的反馈信息；第三是所谓“专家治国论”，即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协调机构，使经济专家和政治家在政治优先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些理论对挪威政府的经济政策有深刻影响。他提出的“决策模型”和其他为政府制定计划的经济模型被广泛采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弗里希的主要兴趣转向指导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搞“经济计划”，力图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最优方案。此外，在消费者行动、经济福利理论、指数论、国际贸易和人口理论上都有所建树。

由于弗里希在经济计量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方面做出的贡献，1969年他与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一起被授予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宾斯·莱昂内尔

罗宾斯·莱昂内尔（1898—1984年）是英国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1923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1929—1961年任该校教授，1962—1967年为兼职教授。1968—1974年任学院董事会主席。1939—1946年任英国战时内阁经济组组长；1961—1970年任《金融时报》社社长。此外，罗宾斯还担任过英国科学院、英国国家美术馆、皇家经济学会、皇家歌剧院等一系列公职或荣誉职位，并于1958年被封为非世袭贵族。

罗宾斯的主要代表作品有：《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理论》（1952）、《罗伯特·托伦斯与古典经济学的演变》（1958）、《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发展理论》（1968）等。

罗宾斯是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同其老师坎南一起坚决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使得伦敦经济学院长期成为英国经济自由主义中心。他强调价格制度和市场机制能够最合理地配置生产资源，他抨击集体主义经济降低工作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妨害个人自由，他指责工会组织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使得企业难以盈利从而不能维持充分就业，于是造成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总之，他是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

罗宾斯于1932年发表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是一本有广泛影响的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该书旨在恢复西尼尔、穆勒、凯恩斯等人为代表的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声誉，排斥历史学派或制度学派繁琐的经验研究，力主依据经验事实得出若干一般性的假设（这同奥地利学派主张先验性假设条件的有效性不同），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理论结论。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的主观性质的有效性。因而他的方法论仍未脱

出主观经验主义性质。罗宾斯在该书中提出经济学应是对个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进行合理选择的研究观点，已被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有关微观经济分析）广泛接受。他对经济学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把人类行为作为可替代使用的给定目的与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按照这种解释，经济学最终变成了人类行为学的一个分支，不必再研究实际的经济现象和进行经验论证，它只是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们所抉择的活动目标。这对以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发生重大转折起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罗宾斯后来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经济思想史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理论》和《罗伯特·托伦斯与古典经济学的演变》这两部著作使其名望大增，确立了他作为世界一流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地位。然而，罗宾斯身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并未做出过显著的理论发现，也没有形成其独特的一套学术思想，因而他对西方经济学发展所起的实际影响并不大。

岗纳·米达尔

1898年12月6日，岗纳·米达尔出生于瑞典卡尔卡利亚省古斯塔夫教区塞尔沃博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

童年的米达尔对自然科学很有兴趣。他刻苦好学，立志长大了献身于自然科学。1919年，年满21岁的米达尔以优异成绩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这时，他放弃了研究自然科学的志向，改学法律，因为他“渴望了解人类社会到底是怎样运动的”。但是不久米达尔失望了，又迅速转向了经济学。他觉得经济学的方法比法律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

1923年，米达尔大学毕业后开业当了律师，但他对经济学的兴趣有增无减，米达尔一面工作，一面刻苦钻研经济理论，投身于著名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戴维·戴维森等人门下，虚心求教。1923年，他发表了《价格形成和经济变化》一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讲师。

1925年至1929年，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访问了英国、法国和德国。1929年至1930年，米达尔又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学习。他对这些先进的工业国家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整个资本主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深深地震动了米达尔，他认为自己必须从纯粹经济理论家的框框中解脱出来。大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活动。1930年，米达尔发表了《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接着又出版了《周期和财政》、《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等著作。1933年，年仅34岁的他便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希尔塔讲座的教授，接替了国际上知名的经济学家、瑞典学派创始人之一卡塞尔的职务。同时，米达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成为瑞典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人物。后来，他多次

当选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参议员，并任瑞典财政、经济和社会问题顾问、国家银行董事、瑞典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商务部长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等职。1960年，他又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国际经济学教授，从事教学和经济发展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米达尔受教于瑞典学派的鼻祖威克塞尔，他对这位老师和长者十分敬重，但在学术上他并不迷信他，而是大胆创新。1931年，米达尔发表了《货币均衡论》，对威克塞尔“自然利率”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和发展，一举成为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达尔指出，威克塞尔纯技术意义的“自然利率”概念，在货币经济中是自相矛盾和无法确定的。他认为，货币利率也必须包含在用来确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他还提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时，把收入、费用、储蓄和投资等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种类型。前者指分析期间开始时预计的数值，后者指分析期间结束时已实现的数值。这一观点已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被广泛采用。米达尔还将预测引入经济分析过程中，从而为静态经济学转变为动态经济学铺平了道路。米达尔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国家计划来“指导和调整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分配，以增进公共福利”，克服资本主义的“缺陷”。30年代以来，他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和在经济界的影响，努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这对瑞典经济的发展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米达尔的妻子阿尔娃（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西方妇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俩对人口问题都很感兴趣，认为人口问题是整个社会计划的一部分，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关键”。1924年，这对新婚夫妇尚未度完蜜月，便着手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力合作，发表《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这部著作不仅引起了瑞典广大群众的关注，且直接影响了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社会政策。米达尔被任命为住房和人口委员会的负责人。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国家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广泛采纳了米达尔夫妇的基本观点和具体建议。米达尔提出，解决人口

危机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出生率。他认为，政府应当承认保护儿童是它的任务，而不管公民个人收入多少。他主张社会平均承担“抚育儿童的经济负担”，他们也提倡合理节育。

米达尔深知一个经济学家也应当是个出色的社会调查工作者，一个一生关在书斋里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是不会有有多大作为的。

通过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深入调查分析，米达尔 1944 年发表了《警告乐观主义》一书。他断言，“战后的繁荣时期一经消逝，物价管制一旦取消，接着就会出现严重的不景气现象”。历史又一次证明他的分析是中肯的。

米达尔非常强调“现实主义”，不管是经济理论、种族关系，还是世界性的贫困问题，他都要用“现实主义”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东西，他都加以揭露和批判。早在 30 年代初期，米达尔就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抨击，40 和 50 年代以后，其战斗精神更加焕发。他的《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1968）和《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1973）等著作集中反映了这一特点。米达尔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完全不适用于不发达国家。米达尔主张采用制度方法，对一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体制下，不存在独立的经济、政治或社会问题”。

1945 年至 1947 年，米达尔就任瑞典政府贸易和商业大臣时，曾代表政府与前苏联进行贸易谈判，他同财政大臣维格福斯同意向前苏联提供 2.78 亿美元的商业贷款。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不仅国内一些人吵吵嚷嚷，其他国家也说三道四，米达尔毫不退让，他声称瑞典“保留判断为了增进国际间合作采取各种措施是否合适的充分自由”。在他的坚持和推动下，瑞苏贸易协定于 1946 年 9 月终于签字。

米达尔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 年代至 30 年代，他的经济学研究属于新古典主义传统，研究纯粹理论问题。他作为瑞典学派的创建者之一，继

承了威克塞尔的传统，对资产阶级的—般动态均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指出的米达尔“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首创性研究工作”，就是指他在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1931年，米达尔在其名著《货币均衡论》中，对威克塞尔“自然利率”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和发展。他指出，威克塞尔“自然利率”概念，在货币经济中是自相矛盾和无法确定的。米达尔认为，货币利率也不须包含在用来确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时，把收入、费用、贮蓄和投资等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种类型。前者指分析期间开始时的预计数值，后者指分析期间结束时的实现数值，由此来说明货币均衡条件，也就是经济均衡条件，说明社会储蓄与投资等式的事前观察，为何经过供给和需求的调整，达到事后的均衡。这一观点已被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广泛采用。

第二阶段，自40年代起他就转向制度经济学研究，即从结构上或制度上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指出的“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就是指他在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使他研究的方向转变，是由于他研究社会平等问题引起的。30年代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严重地影响了瑞典的经济，生产下降，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广大人民群众陷于生活贫困的境地，可是同时社会上另一部分人却仍然很富裕。这种情况，使他开始研究社会平等问题。1934年，他与妻子合作，出版了《人口问题的危机》—书，提出实行均等化社会改革的一些主张。1944年，他写作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该书从生活条件最差的人的角度，研究了美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米达尔开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平等问题，研究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穷困问题和均等化社会改革问题，并进而研究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研究社会不平等问题涉及面很广，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问题，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使他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转到制度经济学的研

究，而成为一名制度经济学家。

为表彰米达尔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成就，表彰他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研究成就，1974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米达尔还获得了很多其他荣誉和奖励。1938年获得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曾获得应用人类学会的马林诺斯基奖，1944年获得安尼斯菲尔德—沃尔夫奖。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英国科学院、美国文理科学院的成员，是经济计量学会和美国经济协会会员。

弗雷德里奇·哈耶克

1899年5月8日，弗雷德里奇·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

哈耶克勤奋好学，早在中学时代就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在大学里，他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维塞尔的得意门生。1921年，仅22岁的他就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随后，他一面在奥地利的行政机关工作，一面继续在大学攻读，决心拿下第二个博士学位。两年后，哈耶克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不久，他获准离职前往美国继续研究经济学。在美国，这个赢得了两个博士头衔的年轻学者放下架子，虚心求教。为了获得真知，他甘愿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他曾在纽约大学当过杰里亚迈·W·詹克斯的研究助手，曾协助过威拉德·索普为《商业分析》一书搜集和整理材料，他还到过哥伦比亚大学旁听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和韦斯利·C·马歇尔的演讲和讨论会。

哈耶克回国后继续在奥地利行政机关供职，同时进行经济学的研究。1929年，他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讲师兼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1931年，他离开奥地利前往伦敦大学担任托克讲座的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1938年，他入英国籍。1950年后，他曾先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弗赖堡大学和塞尔茨堡大学执教多年，最后于1977年回到弗赖堡大学。

哈耶克属于庸俗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该派理论的核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他继承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理论，并对该学派的传统理论做了重要补充，从而成为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运用“迂回生产”和“投资期间”等概念来考察经济周期问题，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之于银行体系的信用扩张超过了人们的

自愿储蓄，这引起投资期间的不适当延长，因而破坏了生产结构的均衡状态。他说：“商业周期的原因并不是货币价值的变化，而是货币数量的变动。”为了根治国家通货流通过大，哈耶克建议在银行法中增加一条，即银行发行的纸币应当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他医治通货膨胀的药方是取消政府对“创造货币”的垄断，实行“货币非国有化”。另外，哈耶克还提出了不同经济制度运转的效率问题，提出“信息分散”的概念，认为经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和知识，都分散在千万人的头脑中，集中计划的决策人根本无法掌握，因而他极力鼓吹自由主义，强烈反对集中计划和国家干预。

哈耶克喜欢争论，他几次在国际上挑起大论战，其好斗精神久已闻名。他属于保守经济学派，他的自由放任的主张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针锋相对。1931年，哈耶克刚踏进伦敦大学的大门，即同凯恩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他应伦敦大学经济学家罗宾斯·莱昂内尔的邀请，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文章。凯恩斯毫不相让，马上指使人对他的《价格和生产》一书进行评论。紧接着，他和凯恩斯直接展开了唇枪舌战，其他经济学家也纷纷卷入。从1932年到1937年，哈耶克就货币理论、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以及工业的波动等问题又发表了10篇文章，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凯恩斯起而反击，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倒向凯恩斯一边。他们认为凯恩斯的扩张经济理论较之哈耶克的货币节制论，更适用于通货紧缩和大规模失业时期。这样，他和凯恩斯之间持续了五六年之久的“这场戏”暂时告一段落，他败在凯恩斯手下。

哈耶克并未认输。1944年，发表了《通向奴役的道路》，在国际上又挑起了一场争论。这一次，他的剑不仅刺向了凯恩斯主义，而且还对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极力鼓吹自由主义，猛烈攻击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他说，“中央计划经济不仅是潜在的危险武器，而且也是一个没有什么效率和难以应用的工具”，甚至会导致“专制”、“独裁”。实际上，这本书是他的反共檄文。

该书一问世，马上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保守派狂热地赞扬它，称它是“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图书之一”，新政派和进步人士猛烈地抨击它，认为这本书是“不现实的和非历史的，可怜而无效地想恢复 19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理论”，并强烈批评他的顽固反共政治态度。这本书适应国际上保守势力的需要，成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不仅在报纸上连载，在电台上广播，甚至还改编成戏剧在无线电节目中播放。他踌躇满志，沉浸在“胜利”之中

哈耶克认为，社会科学家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1975 年，哈耶克在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后作《知识的虚伪》的演讲时，对经济学家们“在极其狭窄知识的基础上对扩张性经济的宏观效果进行预测的倾向”大加讨伐。他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他不仅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还从事科学方法论、社会学、法学、政治哲学、心理学及思想史的研究。他在很多领域都有较高的造诣。哈耶克既是知名的经济学家，还是出色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和演说家。哈耶克虚心向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学习，获益匪浅。例如，奥地利哲学家波珀和英国学者普兰特人在哲学、思想史的法学方面对哈耶克都有良好的启发。

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继承了北欧学派威克塞尔的中性货币学说和维也纳学派米塞斯的信用周期学说。他的货币理论是关于货币对各种商品之间不同交换比例的影响的理论。哈耶克认为，货币的一般价值问题无关重要，和其他商品不同，货币没有什么客观价值。他的货币理论就在于说明货币在什么时候对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影响，在什么时候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发生影响，即保持“中性”或“中立”，以及货币保持中性的条件。哈耶克认为，“资本化生产体系”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即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的方法。就是指大部分原始生产资料不是用来满足目前的需要，而是用来生产比较长远的未来的消费品的生产方法。如果生产过程更长，就是“更加资本化的生产方法”，即是更加迂回的生产方法。这样，就会出现新的生产阶段，使生产的纵向结构不断扩张，生产过程

不断延长。这种方法意味着生产阶段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间接，越来越迂回。为生产消费者物品的中间物品与消费者物品的比例同迂回生产过程的长度成正比。从一种迂回生产过程长度到另一种迂回生产过程长度的变化就是“生产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具有重大的关系。它一方面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取决于原始生产资料和来自上一生产阶段的中间产品的成本。因此，价格是决定生产方向的最现实和最重要的因素。是否会发生生产结构的变化，关键就看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者物品需求总量同消费者物品需求总量之比。如果这种比例增加时，就会发生生产结构的延长；相反，这种比例减少时，就会发生生产结构的缩短。其原因，或者是储蓄数量变化的结果，或者是货币数量变化的结果。当生产结构的变化起因于储蓄数量变化时，经济体系会自动建立起新的均衡。当生产结构的变化起因于货币数量时，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失衡并爆发经济危机。理想的状态是，生产结构应当完全适应消费者物品和生产者物品之间的，由自愿储蓄和自愿消费决定的需求比例。为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必须使货币保持中性，即必须使货币对价格形成和生产迂回长度不发生影响。为此，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货币总流量固定不变；第二，一切价格都完全伸缩自如；第三，一切长期契约都建立在对未来价格变动的准确预测基础之上。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他在其《货币的非国有化》（1976）一书中，也对停滞膨胀的原因做出了独特解释，并提出了旨在解决停滞膨胀的自由货币政策的主张。他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现象是国家干预造成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经济，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货币制度，生产者和消费者就能及时获得市场信息，从而能够合理地 and 有效地分配和利用经济资源。他认为，货币并非一定是政府“创造的”法币，而是可以自由形成。一个良好的货币制度，就能够使货币的供给量等于市场的实际需要量。因此，萧条、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根源在于国家对货币的垄断权，解决的办法是实行“货币的非国家

化”，即自由货币政策。这是他的主张。

为了表彰他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首创性研究工作，1974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耶克先后获得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名誉教授和名誉会员称号。1947年，他与多人发起组织一个国际性学术团体——佩勒林山学会，他曾先后任该学会的会长和名誉会长。

柏蒂尔·俄林

1899年4月23日，柏蒂尔·俄林出生在瑞典南部的柯里潘村。

俄林16岁读完了中学，于191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隆德大学。在那里他开始学习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了隆德大学的课程，获得了学士学位。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服兵役，期满后又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在著名教授古斯塔夫·卡塞尔门下当研究生。

为了扩大视野，他加入了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在那里，聚集着全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除了他的老师赫克塞尔外，还有达维·达维逊、克纳特·威克塞尔和古斯塔夫·卡塞尔等。他们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在货币理论方面，他就深受威克塞尔的影响。

1919年，赫克塞尔发表了关于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影响的重要文章。文章里着重分析了李嘉图比较成本差别背后的事实，并对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了修正。赫克塞尔的分析方法引起了俄林的极大兴趣，这促使他把很大精力集中于对外贸易理论的研究。

1922年，俄林在向卡塞尔提交的博士资格预选论文里，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初步大纲。这个大纲成为他后来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随后，俄林先到英国剑桥大学短期学习，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一年。他虚心向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弗兰柯·W·陶西格、约翰·威廉姆斯等求教。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途中，他再次到剑桥大学，向著名经济学家A·C·庇古求教，获益匪浅。

出国学习使他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思想。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后，即抓紧时间完成博士论文。1924年5月28日，对俄林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瑞典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来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他满怀信心地站在答辩席上，有条不紊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回答提问。答辩持续了五个半小时，他终于以创新的论点，有说服力的论据赢得了教授们的称赞。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被授予副教授职衔。

俄林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不做已有理论的奴隶、勇于探索和创新。他认为，后来者的任务不是对名家的理论仅仅做些解释，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创新、突破。他登门求教于陶西格，但他并不同意陶西格的古典贸易理论；他尊敬老师卡塞尔，但他决心冲破卡塞尔的封闭贸易均衡理论；他赞赏赫克塞尔的开放贸易理论分析，但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完善。因此，俄林所提出的贸易理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关于区域和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体系第一次较完整的阐述。正如他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指出的，虽然在冲破卡塞尔封闭贸易均衡理论上他与赫克塞尔不同，但他的理论深受赫克塞尔理论的影响。虽然他的理论模型是建立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双重价格分析基础上，但卡塞尔的单个市场均衡理论却是他理论模型的起点。俄林取得的成就真可用得上中国的一句成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然，创立一种理论很难，而要赢得权威们的承认则更难。早在1922年，在老师卡塞尔的建议下，俄林曾把自己的贸易理论摘要写成《国际贸易结果和原因的主程分析》寄给英国《经济月刊》。杂志编辑弗朗斯·艾得奇沃斯把他的文章转给另一位编辑，即后来很有名声的凯恩斯，征求意见。凯恩斯对这位年轻人的文章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在便笺上写道：“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价值，应该拒绝。”就这样，文章被退回了。可贵的是，俄林并没有因此而懊丧。他不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还毫不示弱地在许多问题上与凯恩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925年，俄林参加了获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经济教授的竞争。按照挑选委员会的规定，参加竞选者必须在三个月内就指定

的题目写一篇论文，在 48 小时之内准备一篇讲演。结果，竞选时，俄林以三比二的优势获胜。这样，年仅 26 岁的俄林，成了当时最年轻的教授。1930 年，他应聘回到母校斯德哥尔摩商业经济学院，接替他的老师赫克塞尔任经济学教授，从此担负这一职务达 35 年之久。

俄林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瑞典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一直雄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能爬上首相的宝座。他刚任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不久，就当上了自由青年协会的主席，一举成为政坛上引人注目的活跃人物。1938 年，俄林当选议会议员。1944 年，他出任瑞典主要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同年，在联合政府中任贸易部部长。他连任自由党主席达 23 年之久。

自进入政界之后，他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写出了大量论著，而且多次出国讲学。他研究了税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利息理论，等等，他曾到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地讲学。直到俄林去世的前两年，还写了《经济活动的国际配置》等重要著作。俄林一生中发表了大量论著，可惜许多都是用瑞典文写的，其影响没有像《地区间和国际贸易》一书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

为了表彰俄林对经济学，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理论所做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于 1977 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与他一起获奖的还有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爱德华·米德。评选委员会认为他们“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运动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俄林从 16 岁跨入经济学的大门到获得诺贝尔奖金，奋斗达 60 余年。1979 年 8 月 3 日，也就是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三年，他与世长辞了，享年 80 岁。

直到去世之前，俄林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979 年三四月份，也就是去世的前三个月，他曾先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多次讲演。回国后，他又安排了 6—11 月份的研究计划。短短的五个月，他为自己安排了五项研究和写作任务：一、关于瑞典模式问题；二、工

资收入者和其他人的资金问题；三、对货币理论的评论；四、剑桥和斯德哥尔摩在货币及变量分析方面的分歧；五、1952—1960年间的自传。前四项他已经完成了，只有最后一项还摊在办公桌上，未能完成。

俄林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运动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

早在1922年，他在其博士资格预选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初步大纲，成为他后来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1924年，在其博士论文及答辩中，他提出的贸易理论被认为是第一次较完整地阐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关于区际和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体系。1931年，他把自己的贸易理论体系进一步加以充实、修改和提高，完成了著称世界经济论坛的著作《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至此，最终形成俄林贸易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很快就被写进当时世界上一些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被称为赫克塞尔—俄林模型。

俄林的贸易理论体系，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分析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他认为，不同地区或国家间存在着生产要素资源的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相对价格的不同，而价格差异又使得贸易交换有利可图，从而导致地区间或国家间的贸易交换。在没有特别阻碍及有关地区或国家间需求差异较小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或国家所出口的，将是那种能利用自己丰饶资源的商品，所进口的则是那种自己稀缺资源的商品。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源比较占优势基础上的贸易不断扩大，会导致成本不断增加，而贸易交换又会使原有的相对优势均等。因此，他比较详细地分析了生产要素供给的反应、进口关税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规模经济对于贸易的作用，论证了国际贸易及国际劳动分工的形式，生产资源对分工的作用及对贸易交换的影响。

这个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国（或不同地区）利用贸易交换发挥自身优势、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根据这个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就应放宽贸易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因为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给贸易

国家间带来福利。

俄林标榜自己是社会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他的一系列理论都与凯恩斯主义非常相似。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时期，他多次发表论文或为政府起草报告，均极力强调国家垄断干预对于解决失业和复苏经济的关键作用。例如他的《货币政策、公共工程、补贴和关税是消除失业的工具》一文，就对瑞典政府当时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被认为与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基本思想一脉相承。

1969—1975年，俄林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主持颁发这项资金的评选工作。

爱德华·张伯伦

爱德华·哈斯丁斯·张伯伦（1899—1967年）是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竞争理论的创立者，20世纪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张伯伦1899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拉康纳，1920年毕业于依阿华大学，1922年获密歇根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获波士顿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1967年在哈佛大学任教，1934年任教授，1937年起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1948—1958年接任哈佛大学著名刊物《经济学季刊》主编，1965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委员。1967年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去世。早在1927年他还是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时，就完成了以《垄断竞争理论》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1931年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几乎与英国的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同时，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垄断竞争理论》，从此一鸣惊人。他的主要著作有：《垄断竞争理论》（1933）、《走向更一般的价值论》（1957）等。

张伯伦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创立了垄断竞争的厂商理论；提出了“大集团实例”，产生了市场结构作为纯粹竞争与垄断之间的统一体的概念，并由此成为创立现代工业组织分析之父；打破了罗宾逊所谓工人“剥削”的概念，因为在非纯粹竞争的行业里，工人获得的是边际收益产品，而不是边际价值产品，张伯伦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被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其他经济单位所接受，但都被厂商当作一种外部收入约束来对待；另外，张伯伦通过出版他与其学生一起进行的模拟市场运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而成为现代市场经验研究的创始人。

张伯伦认为，垄断性竞争市场结构是指这样的结构，其中，厂商感到竞争力量的外部压力，它不同程度地由垄断力量对其产

品定价所缓和。他强调用产品差异和销售成本来说明垄断竞争厂商的行为，把产品看成是有差异的，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张伯伦的贡献在于，将垄断竞争体系建立在产品差异这一普遍现象之上。他对垄断竞争与纯粹竞争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垄断就是独占。相应的，“纯粹竞争”是存在着大量的买者和卖者；同时，出售的商品没有差别、即完全一样或标准化，因此可以相互替换。张伯伦认为，纯粹的竞争或垄断在经济生活中都是罕见的，大量存在的是垄断和竞争的混合，即“垄断竞争”。因而，张伯伦的垄断理论又被称为“垄断竞争理论”。他认为，在这种既有垄断又有竞争的现实经济下，根据纯粹竞争理论，必然得出价格和成本太低、生产规模过大的错误结论；而如果考虑到销售成本，纯粹竞争理论的错误不再仅是程度上的问题，将会使以纯粹竞争的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来推算价格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纯粹竞争条件下根本没有销售成本，这样，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就只是一种虚构的、不切合实际的、仅包括一部分需求和成本的曲线，因此，纯粹竞争条件下由两条供求曲线相交的价格不仅仅是太低，而且毫无意义。同时，他通过建立个人均衡和集团均衡分析了垄断竞争下的厂商均衡。他首先研究了个别厂商的销售量与价格的均衡问题，他称之为“个人均衡”，然后再进行所谓“行业分析”，研究整个行业的“集体均衡”。他认为，个别厂商在决定其产量（销售量）时，一方面要考虑增加产量会增加多少收益，即边际收益；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增加产量会增加多少成本。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厂商就会增加产量，直至两者相等为止，此时利润最大，或亏损最小。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就不会扩大或缩小产量，或者说达到“均衡”状态。同时，他把垄断力量公式化为操纵价格，把控制市场的卖方垄断包括在垄断竞争的概念之中，认为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的核心特征是决策中那种看得见的依赖。从20世纪50年代起，张伯伦将其研究的重点转向呈现特异的卖方垄断方面，对拥有略有差异产品的销售厂商的十分现实的市场结构进行缜密的调查，揭示出了卖方垄断式竞争的厂商的等级群。这是其垄断竞争理论的特点。

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继承了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方法，研究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企业（厂商）如何决定产品的销售数量和价格问题，也就是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形成问题。可说是对马歇尔的传统经济学的的一个补充和发展，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现象的描述更接近现实。同时，张伯伦首次详细地研究了销售成本，这对广告经济学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由于张伯伦把市场看做是包含从纯粹竞争到有竞争的垄断，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垄断的全变数范围，后来的学者便可以放弃纯粹竞争的模式去讨论更加复杂的市场。

亨利·哈罗德

哈罗德（1900—1978年）是英国经济学家，生于英国诺福克。1919年进牛津大学，专修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学。1922年毕业后去剑桥大学，在凯恩斯指导下学习经济学一年，此后长期在牛津大学任教。1940—1945年间在英国政府工作。1945年继凯恩斯之后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刊物《经济学杂志》的第三任主编。二战后，除继续在牛津大学执教外，于1947—1950年任联合国就业与经济稳定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等职。

哈罗德的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学》（1933）、《论商业循环》（1936）、《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生平》（1951）、《反通货膨胀改革》（1958）、《动态经济学》（1973）等。

哈罗德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主要是把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引进国际经济学，考察了一国进出口贸易量与国民收入和就业、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收入分析”，提出“国际贸易乘数”的概念。在《论商业循环》一书中，试图在引进市场垄断因素基础上建立动态经济学理论体系。他在该书中把凯恩斯的乘数原理与前人已提到的加速原理（他把加速系数称为“关系”）结合起来，解释周期性的累积的扩张和累积的紧缩这种经验现象。其后，哈罗德在《论动态理论》（载《经济学杂志》1939年3月）一文中，一方面应用均衡分析方法，探讨实现均衡所需的条件，另一方面把凯恩斯的短期静态（或比较静态）宏观均衡分析长期化、动态化，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式”。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基

基础，研究在长时期内一国经济均衡增长所需条件的理论模式。哈罗德在论证其经济增长模型时提出的基本假设条件是：第一，社会只生产一种既可用于消费又可用于投资的产品，即这种模型是一部门增长模型。第二，只有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而且，资本—劳动的比率是固定不变的。第三，规模收益不变。第四，不存在技术进步。以 G 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国民收入增长率， S 代表储蓄率； C 代表资本—产量比率，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亦即增量的资本—产量比率或加速系数；则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G = S/C$ ，这就说明了，在技术不变，从而资本—产量比率（ C ）不变的条件下，要经济增长维持一个固定的比率，这一经济增长率所要求的投资率一定要等于储蓄率，即长期稳定的增长率要保证储蓄等于投资，这一模型既分析了长期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又分析了资本增加（即储蓄率提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这一基本公式的基础上，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经济中短期与长期波动的原因。在进行这种分析时，哈罗德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 G ）是指实际上所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它由实际储蓄率（ S ）和实际成本产量比率（ C ）决定。所以： $G = S/C$ ；有保证的增长率（ G_w ）指长期中能使计划的储蓄与计划的投资保持相等的经济增长率，它由合意的储蓄率（ S_d ），即长期中计划的储蓄率，和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 C_r ），即资本家感到满意，并愿意保持下去的计划的资本—产量比率所决定。所以： $G_w = S_d/C_r$ ；自然增长率（ G_n ）指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它由最适宜的储蓄率（ S_o ）和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决定。所以： $G_n = S_o/C_r$ ；长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相一致，即 $G = G_w = G_n$ ，如果这三种增长率不一致，则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或长期波动。

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不一致会引起经济中的短期波动。当实际增长率大于有保证的增长率（ $G > G_w$ ）时，会引起经

济中累积性的扩张。因为这时实际的资本—产量比率小于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 ($C < Cr$)，资本家会增加投资，使这两个比率一致，从而就刺激了经济的扩张。相反，当实际增长率小于有保证的增长率 ($G < Gw$) 时，会引起经济中累积性的收缩。因为这时实际的资本—产量大于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 ($C > Cr$)，资本家会减少投资，使这两个比率一致，从而就引起了经济收缩。

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一致，会引起经济中的长期波动。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自然增长率 ($Gw > Gn$) 时，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经济将会出现长期停滞。或者说合意的储蓄率大于最适宜的储蓄率 ($Sd > So$)，储蓄的不足导致经济停滞。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小于自然增长率 ($Gw < Gn$) 时，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没有达到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的程度，经济将会出现长期繁荣。或者说合意的储蓄率小于最适宜的储蓄率 ($Sd < So$)，储蓄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

在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扩张与就业》、《资本扩张、增长和就业》以及《资本积累问题》等论文中独立地提出了与哈罗德相类似的增长模型，因此，一般把这两个模型合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这个模型是最早建立的增长模型，对以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影响。这一经济增长模型的最大优点是，它所提出的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 $G = Gw = Gn$ 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个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被称为“刃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其他经济增长模型都是要解决这个“刃锋”问题而产生的。

哈罗德还提出了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的理论。该理论的特点是，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资本——产出比率是不变的，从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不变，利润率也不变。这也就是说，这种技术进步并不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只是使每单位劳动由于配备了更多的资本而提高了效率。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对产量增加的作用与人口增加完全相同，所以又称为纯粹的扩大劳动的技术进步。

此外，哈罗德还针对当时英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提出了一些

观点，如引进对外贸易因素，来考察国民收入的动态增长问题。战后，英国的生产发展缓慢，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逆差。用降低外汇汇率来加以补救的办法，其好处是不一定使国内经济活动下降或者失业增加。但是，采取这种办法的前提条件是该国的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有足够大的弹性，而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是值得怀疑的事情。因此改变汇率的办法，其效果是不能保证的。而采取国内经济紧缩措施，能肯定无疑地恢复对外收支平衡。但哈罗德对此也不赞成，因为它成功地把握性依赖于它造就出另一个祸害（失业）的能力。这就需要在消除失业和对外收支平衡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哈罗德认为消除失业有着至高无上的优先地位。宁可对自由贸易作适当的限制，也不宜采取紧缩措施，因为前者所带来的损失要小于后者所带来的损失。

哈罗德还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既关系到对外收支平衡，又关系到国内资本形成，而后者同增长问题密切相关。有人认为对国际资本移动实行限制，比对贸易实行限制更为可取。哈罗德认为，对国际资本流动实行限制的原则，不是为了平衡对外收支，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增长问题上，即资本流动对增长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来讲是否合适。政府当局应该从动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眼睛盯在增长率——出口的、进口的、资本所得的等等的增长率上面，而不是盯在短期的静态的效果上面。政府当局根据这个原则，来确立一个资本的最适度流出（或流入）率，从而对国际资本移动进行适当限制。